

A nighttime photograph of Tiananmen Square in Beijing.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is illuminated with warm yellow lights, and the Chinese national emblem is visible on its facade. In the foreground, a group of people, some wearing helmets, are silhouetted against the bright background. The overall atmosphere is somber and historical.

“6·4” 1989

——震惊世界的七周

目 录

前言	1
“6•4” 1989 ——震惊世界的七周	
天安门事件：震惊世界的七周.....	3
天安门事件与工人阶级.....	8
“6•4” 之后.....	17
见证中国——天安门事件.....	25
中国群众运动大事件年表.....	43

前言

1989年天安门广场上所发生的运动和由此导致的6月4日血腥大屠杀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它甚至也是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从4月中旬直到6月初，在七周的时间内全中国数以百万计的群众走上街头。在天安门运动被镇压6个月之后，东欧的斯大林主义一党专制政权纷纷土崩瓦解，1991年8月曾经不可一世的苏联也彻底垮台。

自由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理论家们由此声称资本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是远胜于所谓的“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的经济制度。但这一论断如今却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变得不堪一击，50万亿美元的金融资产一年之内荡然无存，这约相当于10个中国的GDP总额。一些评论家甚至将之称为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的“柏林墙倒塌”。每个月有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正被摧毁，不仅是在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数百万人重归绝对贫困。

斯大林主义的崩溃使资本主义制度获得了巨大的宣传胜利——“社会主义已经死亡”——它们在全世界范围内攻击已经迷失了方向的劳工运动。它同时还拆除了民族和国家的屏障，是资本可以肆无忌惮地剥削东欧、俄罗斯、中国、印度以及其他所谓发展中国家。但是，斯大林主义，即由不承担任何责任的官僚精英控制非资本主义的国有经济，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需要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自己组建的民主机构——包括选举产生的工人委员会、工厂委员会、农民委员会和其他基层群众控制的工会。正如伟大的革命家托洛茨基所说明的，在官僚主义的控制之下，计划经济将不可避免地窒息和枯萎；由工人阶级对于计划经济不间断地进行民主控制、检查和调整是至关重要的，这正如‘氧气对于人一样重要’。这一根本性的缺陷——缺乏工人民主——足以解释斯大林主义政权所面临的经济危机，而由于这一危机使得越来越多的前共产主义领导人转向资本主义立场。

在中国，这些矛盾，也包括斯大林主义的国际性危机，都融入到了1989年所发生的事件中。这场群众运动，最初起始于对民主的模糊诉求，并在一定程度上包含有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幻想，这一幻想是由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亲资本主义中共当局内部的右翼执政官僚（赵紫阳派）所引起的，但之后整场运动发展成为对于中共专制统治的挑战。运动很快就超越了学生抗议运动的范畴，并开始影响到广泛的不同阶层——尤为关键的是影响到工人阶级。这对于资本主义‘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而言是个明确的信号，必须采用暴力血腥的手段彻底粉碎运动从而恐吓工人、学生、以及其他阶层以免他们在未来跨越“界限”。

本书由社会主义网站（chinaworker.info）制作以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对这一系列事件作出独立的分析。此外，这也是第一次用中文发布斯蒂芬·乔利（Stephen Jolly）在天安门事件期间的亲身经历。斯蒂芬·乔利是澳大利亚大墨尔本区亚拉市的第一位托洛茨基主义市议员，27岁时曾作为工人国际委员会（CWI）的代表来到中国亲身经历了天安门事件。作为一名外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受到了中国学生和工人的热烈欢迎，并与他们一起讨论了运动前进的方向。《见证中国——天安门事件》一文是根据斯蒂芬·乔利1989年7月在伦敦举行的一次演讲整理而成的，共有500多名青年社会主义者和工人国际委员会（CWI）的支持者参与那次天安门事件的演讨。此外，本册书中也包括有中国劳工论坛的编辑文森特·科洛（Vincent Kolo）和陈墨合作的一篇对1989年运动分析的新作。

“6·4” 1989 ——震惊世界的七周

本书试图总结出以下重要教训：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是否能够成功地改变中国，如果能够的话，应该以什么样的政治纲领为基础？当时所发生的群众运动是否是企图恢复资本主义制度，因此是否当局的镇压是在‘捍卫’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大屠杀和之后的镇压使哪些阶层获益，又使哪些阶层受损？工人阶级在运动中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了解这些问题的答案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在未来中国会发生些什么；工人阶级组织和反抗超额剥削的前景，以及如何才能通过新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实现真正的民主和真正的社会主义。

天安门事件：震惊世界的七周

1989年4月15日，前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因心脏病发作去世。由此触发了一场人类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之一的天安门事件。这场运动的发展很快就超越了其最初发起者的期望，并几乎推翻了所谓“共产主义”的专制政权。

4月17日，第一批抗议人群，约700名学生和教师，从15公里外的大学生校园步行到北京市中心的天安门广场。他们高喊“胡耀邦万岁！民主万岁！打倒腐败！打倒独裁！”的口号。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内，这些口号带来的回响将传遍世界各地。

数以百万计的群众前赴后继地加入到了北京示威活动中，抗议政府的示威蔓延到全国110多个城市。整场运动从开始直到血腥镇压结束之时，示威者一直高唱“国际歌”，而当局的谎言却将这场运动称为是一场“资产阶级反革命暴乱”。仅仅在第一次小规模游行的5天之后，胡耀邦葬礼的当天，20万人不顾政府禁令占据了天安门广场。在北京20多所大专院校发生“学生罢课”，之后一个称为“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高自联）的组织宣布成立以协调不同学校学生间的行动。截至5月中旬，产业工人也开始组织起来并为发展独立工会运动奠定了初步的基础。所有上述事件的发展使当时的中共领导人感到恐惧，他们深怕出现一场“波兰式的混乱”[由此会发展出一个独立的大规模工人运动]。

正如列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所说的，“一场革命就是当群众开始直接对事件发展产生影响，并充分感知到他们进行这种影响的力量。”而这正是对当时中国局势的概括。此时，因为“将资本主义制度重新引入中国”而受到西方政府所赞赏的邓小平当局，却正如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所描述的一样，看起来，“似乎处于一片混乱和无能为力之中”。统治集团和军方陷于深深的分裂中而无力应对。当时工人国际委员会（CWI）的英国支部机关报《战斗派》（Militant）对此描述，“…和平推翻官僚体系的所有条件都已存在…唯一缺少的却是至关重要的部分：清晰的纲领、战略和战术。”[《战斗派》，1989年6月9日]

在1989年6月3日到4日的那个晚上，邓小平和他在执政集团内的‘强硬派’支持者终于趟着成千工人和青年的鲜血重新恢复了他们的统治。邓小平动用了约20万人民解放军部队对中国的首都进行“全面入侵”。而相比之下，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也不过使用了24.8万军队。根据大赦国际的数据，在风暴中心的北京有至少1000人被杀害。在此之后几周和几个月内，有超过4万人被警察搜捕，其中工人所遭受的痛苦甚至远高于学生。任何在运动最后几天曾经组织或者试图组织罢工的工人都被判处长期监禁乃至被以“反革命分子”的名义处决。短命的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工自联）呼吁进行总罢工以迫使当局停止军事屠杀，而其活动参与者都被指控策划武装起义和反对政府，所有人员都遭到通缉与追捕。

阅读本文的读者应该清晰地认知到所有关于“天安门事件”的资料都被当局认为是“煽动性的宣传”而加以屏蔽。对政府而言这正如“卡夫卡恐怖”一样，20年来全面禁止任何关于“64”的新闻与报道。而与此同时，政府不停地重复着“天安门广场没有人死亡”，邓小平是被迫采取行动以避免“社会动乱”和确保“安全繁荣”等诸如此类的谎言。19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经济迅速增长仿佛也为当年的屠杀提供了历史性的辩护理由。

“6·4” 1989 ——震惊世界的七周

但事实正与当时中国当局一些领导人宣称的相反，“镇压 1989 年群众运动并未能防止中国重返资本主义。”中共领导人继续追寻越来越多的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政策并同时进一步强化专制镇压。那些声称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是形影不离的双胞胎兄弟的人士很难解释目前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即‘中国模式’为什么对于资本主义跨国公司而言如此流行。

今天，20 世纪 80 年代一直被描述为相对开放和言论自由的“黄金时代”，但正如“天安门母亲运动”在一份请愿书中所描述的（该组织成员包括在 6 月 3 日到 6 月 4 日当晚被军方杀死的众多平民的父母、亲戚和朋友），“当时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密闭的铁房子”。今年是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六四”20 周年，而且又恰逢灾难性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中共当局处于全面紧张之中。预计会有 8 万人乃至更多的人参加今年 6 月 4 日在香港举行的纪念“64”的抗议集会。当然在中国内地，当局根本不可能容忍类似的抗议活动。而且目前当局已经开始加强所谓的“安全”措施以镇压“泛民主派”分子和任何敢于公开批评政府的左翼和社会主义力量。

综上所述，如今至关重要的是要充分吸取“64”运动的真正的教训，将其从覆盖于上的迷雾重重的歪曲、谎言和误解中挽救出来，并通过新一代人的讨论和研究寻找到能真正改变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道路。

1989 年群众运动的起源

北京的学运活动分子计划在 1919 年的“五四”运动 70 周年之际走上街头进行抗议活动，并确保抗议活动能一直持续到当时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 5 月 15 日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当时戈尔巴乔夫被普遍视为“共产主义政党”（事实上是斯大林主义）集团中的“民主派”。学生有大量的不满，但核心问题是担心他们认为本应该跟随“市场改革”一起发展的“民主化”进程在中国发生倒退，而当时戈尔巴乔夫统治下的前苏联和东欧地区这一进程仍然在蓬勃发展。而胡耀邦逝世的新闻促使学运活动分子根据传统“借悼念死者而谴责活人”的方式进一步加快推进他们的计划。

胡耀邦作为中共党的领导人于 1987 年被迫下台。起因在于他处理 1986 年 12 月在北京和上海所发生的学生民主运动时过于“软弱”。官僚集团内部的“强硬派”担心由于胡耀邦的“软弱”而导致政治不稳定和来自于群众对执政当局的挑战故而迫使‘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牺牲其盟友。胡耀邦是邓小平自 1978 年开始推进亲资本主义“改革开放”政策的先锋。但是他的解职并不意味着政策发生决定性的变化。胡耀邦的继任者赵紫阳是一个更加公开亲资本主义“改革者”。不过胡耀邦的失势加剧了泛民主派阵营和激进学生的担忧，他们担心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将被就此搁置。从而他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必须采取某种行动”以使得天平的指针重新摆回到有利于他们的一端。胡耀邦在许多方面都类似于前斯洛伐克领导人杜布切克，他认为“社会主义应该具有人道主义的特征”，杜布切克于 1968 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被推翻。胡曾经认为中国应从西藏撤出军队。他曾在 1984 年声称“马克思和列宁无法解决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而引起了“强硬派”的众怒。

与此同时，政府激进的市场政策彻底改变了当时的中国社会，在社会诸多领域出现混乱，警示不断。西藏爆发了 30 年来最严重的暴乱和街头抗议。这一抗议运动被当时的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胡锦涛以极为无情的方式镇压下去，而此后同样的暴力镇压也被用于北京所发生的民主运动。1988 年中国通货膨胀率达到 31%，是 1949 年革命以来的最高水平。由于当局

“6·4” 1989 ——震惊世界的七周

的经济紧缩措施，1989年全国超过100万家企业被迫关闭。在4月22日，胡耀邦的葬礼日西安和长沙失业的青年和工人与警察发生冲突。

整整一年时间里，政府的高层内部因困于价格改革的辩论而敌意日深。最初为邓小平所支持的赵紫阳希望能权力推动价格自由并彻底放开市场。在当时的中国，经济上存在着一套“价格双轨制”体系，即同一商品同时存在着计划体系内国家规定的价格和自由的市场价格。这为一部分官僚提供了可以上下其手的绝佳致富机会，他们将国家计划体系内的货物通过各种手段拿到市场上销售以趁机渔利。正如中国“新左派”代表人物学者汪晖所指出的：“仅1988年一年，由于‘价格双轨制’的存在（为官僚提供‘寻租’机会），两种价格间的差额达到357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当时一年国民收入的30%。”[汪晖，《中国的新秩序》，2006年]

赵紫阳提议进一步推进价格改革以彻底消灭利用“双轨制”产生的价格差投机，但在现实中，这会导致物价进一步上升加剧工人和底层群众的生活负担。上层的政治僵局反映了群众的压力，导致价格改革的停滞。但仅仅在6月4日大屠杀3个月之后，这一价格改革计划就得以推行，因为来自群众抗议的威胁已经被彻底“解除”了。

斯大林主义的危机

澳大利亚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当时年仅27岁的斯蒂芬·乔利（Stephen Jolly）正身处北京，在他激动人心的第一手资料中描述道，“我当时觉得我处在整个世界的中心”。很明显，当时中国发生的这场斗争的后果会在国际范围内产生巨大的影响，就如同今天在我们身边所发生的资本主义工业危机和金融危机所发生的影响一样。汪晖认为，“当年在北京所发生的事件引发了苏联和东欧的解体，并促使新自由主义在政治和经济构架上得以全面主宰世界。”

中国工人与青年所表现出的英雄气概和之后随之而来的残酷镇压无疑加速并加剧苏联和其他东欧斯大林主义一党专政国家的统治危机。事实上这些社会早已在危机中摇摇欲坠。基于中央计划和国家所有的经济方式所带来的巨大优势使它们在建国初期迅速实现了工业化，但此后由于官僚国家体制所带来的窒息使经济处于全面停滞之中。假如不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也即是由工人阶级积极民主地介入到社会和经济的整体运行中，那么这一后果是不可避免的。

随着经济危机的日益加剧，斯大林主义政权残酷镇压的本性日益彰显，官僚体制对于工人权利和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损害，群众中的某些阶层产生了对于被这些政权用来进行统治的“社会主义”的名义日渐反感。而这一情绪尤其突出表现在知识分子和官僚阶层本身的身上。中国由于1966-1967年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混乱后果，特别是‘知识分子’阶层被毛派宣传作为“坏分子”，而使知识分子中的相当部分人变得特别敌视‘共产主义’。

在整个斯大林主义世界中，以中国、匈牙利和南斯拉夫为首，部分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官僚开始寄希望于资本主义制度作为维护其自身权力和特权的生命线。在击败毛派‘四人帮’之后，邓小平于1978年掌握政权并在中国开始了一个决定性的转折；虽然当时并没有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完整计划，最初只是试图在官僚计划经济中‘务实地’结合一些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如给予管理层‘奖励’，减少对工人的保护，对私人财富和投资更为开放等。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具有更明确意识的亲资本主义的政治力量在中共政权内部开始逐步

“6·4” 1989 ——震惊世界的七周

浮现，而邓小平和赵紫阳就是其中的关键人物。

在上世纪 80 年代，这一自上而下进行的经济变化所造成的结果是巨大的。首先，所有的农业生产在 1979 年至 1983 年已经私有化，并非如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民主化改造人民公社而是彻底地取消人民公社。这为今后农村地区医疗和教育资金严重不足创造了一个巨大的‘黑洞’（因为过去这些服务的资金一直依赖于人民公社的共同的积累）。同时政府还推出了‘沿海地区开放战略’，将更大的权力移让给东部沿海省份并鼓励它们融入世界市场，特别是通过海外华人的投资得以发展。而且以资本主义方式运行的“特区”也在不同的几个地区得以建立，并随后扩展到更大的范围。其他‘改革’措施还影响了职工就业安全和国有企业工人的福利，同时通过宣传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而称赞物质刺激，并指责国有企业的工人过于“娇惯”。同时在 1986 年通过了一项新的劳动合同从而废除国有企业的终身雇佣制度。这些变化本身还并不等于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但毫无疑问是对计划经济的大量侵蚀和损害工人阶级的地位。

毛派作家李民琪，其本人曾经参与 1989 年运动（尽管他承认他在 1980 年代当时还是倾向于‘新自由主义民主派’）描述了从 1985 年之后所发生的一切：

“官方的电视节目、报纸和杂志积极描绘西方资本主义的高度繁荣和东亚资本主义‘四小龙’所表现出来的活力。似乎只有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已经被落在后面，…资本主义从一个进行超额剥削的血汗工厂的代名词变为民主、高工资、高福利以及工会保护工人的权利的同义词。而事实上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工人阶级才能根据自身的经验感受到资本主义对于现实生活到底意味什么？[李民琪，《中国的崛起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消亡》，2008]。

该如何定义 1989 年运动？

今天由于当局对信息自由和讨论的封锁，所以对于天安门事件本身有很大的误解和混淆。中共政权的一些辩护士仍然将 1989 年事件视作一场“颜色革命”，并将它归类于与 2003 年格鲁吉亚和 2004 年乌克兰所发生的一切一样。直到今天他们仍然希望将运动描绘为亲西方资本主义的，而抗议者不过是外国帝国主义在前台的‘木偶’。这一想法也为中国的新毛派运动中的某些人所接纳，而这主要是基于当初 1989 年运动中某些领导人今天的立场，而不是这些人在当时的所作所为。重要的是如今一些毛派青年已经开始摒弃这样的思想，并将 1989 年事件开始看作是真正的“人民运动”。这是值得欢迎的一大步。

正象众多的群众运动一样，天安门广场的群众运动是极其复杂和多样的。这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在一党专政和而且缺乏独立的工人阶级和其他被压迫层的政治组织。由于长期的处于专制统治的黑暗之下，所以这场运动的组成就犹如“政治彩虹”一样充满各种政治谱系。最初 1989 年运动中的某些力量对于西方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抱有幻想，甚至倾心于“台湾模式”，这虽然是在整场运动中具有影响力的思潮，但绝非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其他一些人则寄望于“重新构造的社会主义”，并在思想上靠拢戈尔巴乔夫。但主要是在工人中，已经存在了反对“改革开放”和捍卫 1949 年革命最重要成果国有资产的想法。在各种思潮中的唯一共同点是对现政权的日益不满，但至于以何种方式取而代之却丝毫没有清晰的概念。

毫无疑问运动最初发轫于知识分子和他们在学生中支持者，也就是今天所称呼的‘新自由主义者’（但在当时这个概念还没有被使用）。在党内他们接近赵紫阳一派力量，他们的政治观点不仅捍卫公民的基本自由权利、新闻自由和集会自由（这些也是我们也完全支持的

“6·4” 1989 ——震惊世界的七周

目标)；而且在不同程度上，支持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制度。但这些人当时的表达并不如之后他们所做的那样直白。不少学生运动的领袖并不想推翻政府，而只是希望能帮助以赵紫阳为首的亲资本主义一翼控制局面。而这一路线也为他们的一个中心诉求所证实：支持（实际上毫无力量的）全国人大召开临时会议对官僚进行质询乃至改选，并使‘强硬派’力量从政府中消失。正如当时的学生领袖吾尔开希所回忆的，“我们当时的目的就是要政府听见我们的声音并与我们对话，这是唯一的真正目的。”

但是，一旦心理障碍被打破——人们就自然会走上街道勇于公开面对独裁——学生的抗议活动就像是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了社会中所有积累的不满情绪。这样抗议运动的闸门被打开了，虽然这些社会力量与学生领袖之间没有充分共享的利益和目标。即使在学生中，也存在着相对年龄较大的更为亲赵紫阳的阶层和另外一个年轻的更激进的多数人群，他们将赵看作为与其他中央官员根本没有什么不同，这反映在群众中对于“太子党”的称呼，——高级官员的儿女通过利用关系进行发财致富变成或正在变成资本家。而就连邓小平和赵紫阳的后代都是臭名昭著的‘太子党’，并遭到数百万示威者的谴责。如当时的一个顺口溜：“毛泽东的儿子上前线，林彪的儿子搞政变，邓小平的儿子做捐献，赵紫阳的儿子倒彩电。”

毛泽东主义对于这场群众性运动也同时具有重要而又引起相当争议的影响。在不少北京以外的地区，尤其是在一些工业城市，群众举着毛的画像或佩戴他的徽章走上街头，以所谓毛时代“极为清贫”的官僚的生活方式与当时邓小平当局官僚们如百万富翁般奢侈的生活方式作为对比。而在北京这种现象并不多见，多数学生对于毛的影响抱有警惕与成见，认为他原比其继承人（邓小平）更为独裁。但即使在北京，学生于5月12日所发起的绝食抗议及采用的口号也多可见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子或索性是它的拷贝。而且某些当时的学运领导人甚至认为采用“绝食抗议”的方式过于激进。然而“绝食抗议”本身却成为运动中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在“绝食抗议”的进程中，其他阶层，尤其是工人阶级，“跨过藩篱”毅然加入到了运动中。

广泛群众阶层的介入使运动改变了性质并使之推向另一个方向：从支持和寻求获得某一派官僚支持的抗议运动日益转变成为一个公开挑战整个官僚体系的运动。而且就当时而言，天安门运动是整个斯大林主义阵营中表现比较奇特的一个现象，——反资本主义，反“市场经济改革”。正如汪晖在2006年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所提到的，而他本人也是6月4日最后一批离开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中的一员，这是一场“广泛的社会运动”而且来源于“对于市场改革冲击所带来的痛苦”。

一场政治革命——仍然保留国有经济的基本原则和其所带来的关键社会进步，但同时使新的政治架构完全置于工人的民主控制与管理之下——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是可能实现的目标。但问题是在于当时缺乏实现这一目标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也就是缺乏一个真正的、深深扎根于工人与学生中的、能在每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从下而上地以清晰的纲领、战术和口号去引导群众运动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够以明确觉悟地方式引导并非有明确自我意识的群众运动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以取代资本主义和斯大林主义。

天安门事件与工人阶级

1989 群众运动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于它是一场以城市为基础的群众运动（几乎不涉及农村地区），它也可被认为是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的第一次真正的城市群众运动。中国衰老的统治者们深刻理解和恐惧这样的运动。毛泽东领导的 1949 年革命虽然消灭了资本主义制度并建立了国有计划经济的基础，但这是一场以农村地区为基础并由等级分明的斯大林主义政党领导的革命；在这场革命中城市中各阶级，尤其是工人阶级，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虽然毛主义——斯大林主义的官僚声称“无产阶级是整个社会的领导阶级”，但是他们害怕这个阶级潜在的巨大力量。当权力得到巩固后，他们就开始系统地阻止独立工人组织的发展。

即使在 1989 年的时候，中国庞大的农村人口占到总人口的 78%，为波拿巴政权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基础。波拿巴政权即是由一个“伟大舵手”掌控的专制统治。马克思对农民角色的解析是：“他们无力代表自己，所以不得不由他人代表。他们的代表往往也就成为他们的主人，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一个不受任何限制的政府权利保护他们免受其他阶级的打击，并由上至下地给他们普施‘阳光和雨露’。因此小农阶层的政治影响最终是通过使社会服从于行政权力而得以表达的。”[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

正是由于此原因，所以从马克思开始所有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都一直强调，工人阶级的决定性作用，通过其阶级本身的民主组织和群众性社会主义政党进行组织，并得以建立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即使在中国这样工人阶级占少数的国家中，情况也应如此；当然他们必须得到贫苦农民和其他被压迫阶层的支持。中国也只有基于这一点才可以重塑其未来。1989 年城市人口只有 1.7 亿，占总人口的 17.9%。今天这一数字是 5.9 亿，占总人口的 44.9%。

工人和学生

一开始学生们尽力阻止工人参加 1989 年的运动。示威的组织者被告知用手臂结成人链不要让工人加入到游行中。迈斯纳评论道：“学生们中存有阶级偏见（知识分子对于工人阶级），他们多反对工人参加民主运动是因为他们认为工人没纪律和有暴力倾向。如果工人参与运动就会给了政府使用武力的借口……”[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1999]

学生最初对待工人阶级的冷漠态度反映了他们害怕工人，至少害怕他们潜在的影响力，会把运动引向不同的方向：反对市场改革。李民琪承认他那时的观点是错误的，评论道：“在一方面，我们（学生）认为这些工人是消极的、顺从的、无知的、懒惰的和愚昧的。然而他们现在都去支持我们。在另一方面，就在几个星期以前，我们还狂热地提倡关闭所有的国有工厂并使得工人们失业的改革计划。”[李民琪，《中国的崛起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灭亡》，2008]

学生们对工人的排斥源自于他们希望这场运动将作为杠杆去影响当局的权力斗争，有利于以赵紫阳为首的激进改革派（最倾向资本主义的派别）。因此，学生都尽最大努力不将工人阶级纳入活动。赵也跟政府中的其他派别一样，要不惜一切代价防止这种情况发展。按照既定的计划，是不应该出现革命性的群众运动。当局态度傲慢的对学生做出威胁性的反应。学生不得不求助于更加大胆和挑衅的抗议方式，并得到了工人阶级和其他各阶层民众巨大同

“6·4” 1989 ——震惊世界的七周

情。最初是慢慢的，然后速度越来越快，反政府情绪充满了工厂，车站，办公室和工人社区。与此同时学生变得更加激进，他们和工人之间的壁垒消失了。

在 1989 年中国大学生还是传统上的精英，但是随着巨大的经济变革，现在的情况发生了改变。二十一世纪以来大学入学人数增加了 6 倍，每三天就有一所大学正在建造（尽管常常没有合格的教学人员）。在过去，拥有大学学位就意味着有了工作并至少可以在国家机构的底层任职。但现在不再是如此。今天的中国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大学毕业生大规模失业的问题。

独立工会的复苏

5 月 16 日，据说是来自中国各省的群众在当局控制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总部门前举行抗议。示威者要求建立独立工会、给予罢工的权利和解雇总工会的官僚们。针对这种压力，据报道，总工会的领导给了学生相当一笔捐赠。根据英国《卫报》的约翰·吉廷斯的一项调查表明，百分之七十的普通工人认为官方工会毫无用处或者和管理层勾结。为了对付工人中对于学生的抗议活动越来越多的同情，“政府发布命令提供的现金奖励给北京工厂的工人，要求他们远离广场。”[吉廷斯，《中国的变迁- 从毛到市场》，2005 年]

但是，随着学生开始绝食，这一试图孤立学生的策略失败了。在 5 月 17 日的支持学生绝食的示威当中清楚表明了这点。正如约翰·吉廷斯所报道的，参加这次示威的包括了首钢、燕山石化、首都医院，西单商场、北京总工会、第一机床厂，管乐器厂，中国重型机器厂以及军工企业的普通工人、人民银行、北京电力公司、，铁道部和其他工厂。在这一阶段已经由工人提出进行总罢工以支持学生运动，但学运领袖们反对这一建议；这是他们所犯的众多严重错误中的一个。

正如吉廷斯指出工人大规模的动员“对当局来说是一个更明确的信号，表明当局已对群众失去了控制。”第二天，5 月 18 日，一群青年工人在广场上宣布成立了自己的自治工会。“我们向全国各地的工人宣布：北京工人已经组织起来了，”他们威胁要发动为期一天的总罢工，除非学生的要求得到满足[法德斯和希金斯，《天安门——北京暴行》，1989]。一个星期后，5 月 25 日在天安门广场成立了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

斯蒂芬·乔利作为工人国际委员会（CWI）的代表去了北京，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他应邀会晤了新近成立北京工自联的领导人。对海外托洛茨基主义者来说这确实是一种荣誉，聚集而来的工人们对他的叙述很感兴趣，包括对世界各地发生的事件，在波兰和其他地方的工人斗争，和工人国际委员（CWI）认为中国应该发展怎么样的群众运动：“一旦这些工人领袖发现了我是谁和我在这里要做什么后，他们都十分兴奋…比学生的反应还要好…”[斯蒂芬·乔利，《见证中国——天安门事件》，1989]

与斯蒂芬·利会晤后第二天，部分工人代表被捕，该组织被当局认定是一个非法的“反革命”武装。这是一个最典型的奥威尔式巧言令色的例子。在大屠杀发生之前，被逮捕的是这些工人，而不是学生，反映了中共对于工人阶级的恐惧。工自联的纲领是很明确的，就是工人阶级要获得国有企业的控制权，以捍卫和延续 1949 年革命的成果。敏锐的中国问题专家约翰·吉廷斯解释道：“它（新工会）特别有威胁性，因其明显地带有独立的社会主义特征。”镇压 1989 年群众运动是从禁止新工会开始的，所以说这次镇压与“保卫社会主义”扯不上任何关系。工自联公开地要求要通过一切合法和有效的手段，去监督所有的国有和集

“6·4” 1989 ——震惊世界的七周

体企业的法人代表，使得工人成为企业的真正主人。在其他（私人）企业中，将通过与企业主的协商和其他合法手段，使该组织能够保卫工人的法定权利。[《国际劳工报告》，1989年7至10月]

戈尔巴乔夫的访问-热度升高

5月15日戈尔巴乔夫访华，是苏联领导人30年来的首次访华，这次访问使中国领导人非常丢脸。原来欢迎戈尔巴乔夫的计划是安排在天安门广场的，但当时这是不可能的。广场上布满了绝食示威者的帐篷，用一个美国记者的话来说，广场就像是一个“东方的伍德斯托克”。这次绝食抗议开始于5月13日，绝食者和全球一样期待戈尔巴乔夫的到来。这次行动无视警察，也不理会赵紫阳要求学生离开广场的呼吁。中国和苏联官员被迫临时把接待改在北京机场。连红地毯都没有了，戈尔巴乔夫也没有能够发表他的“历史性”的讲话。苏联领导人的访问标志着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正如莫里斯·迈斯纳指出：“在那三天，民众支持民主运动的热情高涨——同时邓小平也坚定了用军队镇压运动的决心……”[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1999]。

参加要求政府对学生的要求做出让步的绝食人数，一开始大约160人，但两天内上升到超过三千人。这是一个非常感人的策略。记者黄明珍指出：“当学生们开始绝食抗议，就使很多人感动到流泪。”天安门广场上标语牌写着：“妈妈，我们很饿，可是我们吃不下。”其他一些口号也反映了学生中混乱的意识和对改革而不是改变制度抱有幻想：“在莫斯科他们有戈尔巴乔夫。在中国我们有谁？”和“我们也需要政治体制改革”。体制改革，这是戈尔巴乔夫的口号，沿着市场路线重建经济体制，与赵紫阳和邓小平的改革路线相似。套用毛泽东的话，这又是一起“外国的月亮更圆”——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可靠的信息。然而许多学生指出的一点是，戈尔巴乔夫正在朝着更为民主自由的方向发展，而他的中国同行恰恰走向相反的方向。

绝食使中国整个社会都兴奋起来。5月15日（当天戈尔巴乔夫到达北京）有50万人在北京进行游行。5月17日，超过了100万，这可能是自1949年以来规模最大的群众集会。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参加游行示威的人员对当局来说是一个不祥的信号。游行队伍中加入了数以十万计的工厂工人、办公室职员、教师、穿制服的警察，甚至还有1000名解放军学员。标语包括：“你们的孩子在欺骗，我们的却在挨饿”（说的是“太子党”）和“救救学生”。

领导人会见学生

面对压倒多数的群众支持学生，政府被迫至少表示“同情”，并愿意开始“对话”。5月18日，当天戈尔巴乔夫离开了北京，5个政治局常委（中共最高政治机构）中的4个去医院探望绝食的学生。持强硬立场的李鹏总理和赵紫阳都在电视摄像机前与住院的学生谈话，企图赢得公众的支持。李同意与学生领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电视会议。这是一个笨拙的会见。李试图说服他的听众：“我的三个孩子都没有参与牟取暴利，一个都没有。他们的年纪都比你们大。我们看待你们就像是我們自己的孩子。”[法德斯和希金斯，《天安门——北京暴行》，1989]

如今李鹏无法再说出这样的话。他和他的儿子已经在商业界非常出名，特别是三峡大坝

“6·4” 1989 ——震惊世界的七周

的施工公司都深受他们的影响。三峡大坝源自于李鹏的想法。著名的“新国大”期货公司在1998年宣告破产时欠下超过4000个投资者的5亿元。李的妻子、小儿子和儿媳都是该公司董事会成员。李鹏的儿子李晓勇用假名逃到香港，现在已经获得新加坡长期居住身份，在那里他的生活方式极其奢侈并从事房地产行业。另一个儿子，李晓鹏，是纽约上市的华能国际电力国际公司董事长。在2005年，河北省绳油村，该公司为了建设一个新的发电厂派出打手驱散数百名贫困农民，有6个农民被砍死。

在5月18日他最后与学生的对话当中，李鹏放弃一切伪装并愤怒地告诉他们：“北京完全混乱。此外，混乱已蔓延到全国各地…我可以说，在过去的几天里，北京一直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中…我希望你们学生想一想在这样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我们不可能坐视不管的。我们是要保护学生的安全和生命的，要保护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些话是对着电视摄像机说的，而并非是对着学生。第二天李鹏宣布戒严令。这一决定既非保护“社会主义制度”也并没有保护“学生的安全和生命”！

赵紫阳泡沫的破灭

赵紫阳被迫离开政坛和遭到多年软禁，直到2005年死时，他都被广泛地认为是一个支持学生反对镇压运动的一个领导。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现实的改良版本。他试图依靠这个运动去挫败他的政府统治下的对手，这是真的。但试图进行这种博弈被证明是他力所不及的。这归根到底，并非在于不同领导的个人品质问题，而是他们所代表的路线以及当时的形势发展所决定。问题是：为何大多数改革派或中国政权的亲资本主义派选择“秩序”而不是妥协？

那个时期，政府和官僚中的权贵都深受混乱的折磨。他们感觉正在失去对社会的掌握并渐渐地失去国家机器的控制。赵紫阳和邓小平之间的斗争变得激烈。中国前国家主席李先念抱怨党内有“两个指挥部”，这种状况就鼓励了游行示威者。

赵紫阳和他的支持者都相信他们至少能够拉拢学生们中的中间派。他所计划的是可以部分地满足学生要求，并利用这一“群众的授权”名义可暂时不理睬生活水平的影响而加速资本主义的改革。强硬的斯大林主义者，以及邓小平和大多数的“改革”派是领导层中的实权派。他们更加害怕丢失面子，并且担心他们如对群众的压力作出让步就开了危险的先例。

最后他们获胜，赵紫阳在政府内被孤立起来，他的关于学生“合理”要求的和解声明被视为被叛。事实上，赵对学生的“支持”是不完全的。即使戒严当晚他最后一次含泪访问广场（随行人中包括现任总理温家宝）实际上是要让学生停止抗议。这不是第一次了。他没有参加关键的投票宣布戒严的会议，理由是“生病”了。这些行动不是偶然的，并反映了他的派别非常犹豫不决和焦虑，该运动现在已经超越了他的派别或任何派别的控制。

工人国际委员会（CWI）国际书记处的林·沃尔什总结当时的形势说道：“在关键时刻，官僚政权瘫痪了。所有的客观条件都已存在，以和平或者相对和平的方式推翻官僚的统治完全可能实现。但是缺少了一个决定性的要素：具有清晰的纲领和战术的领导层。[《战斗派》国际观察，秋季1989年]

改良还有希望吗？

当时在北京，警察已经撤离街头，犯罪率在下降，甚至交通也由学生纠察队负责。在5

“6·4” 1989 ——震惊世界的七周

月中旬直到镇压前，已经出现了如马克思所说的“双重权力中心”的状况。这用来描述一个受到动摇的政权与一个新的具有挑战性的权力间为争夺合法性而出现的短暂平衡状况。但当时的中国只有一方面对此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并准备采取行动。而处于上升中的群众的“权力中心”却对此没有明确的意识也未能得以充分发展。学生们回避推翻现政府的目标。自始至终地强调通过“改良”运动使现政府变得民主化。但多重复杂的政治与经济因素意味着这一“改良”计划并不切合当时中国的实际，而只有依靠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群众运动发展出新的政府以取代当时的政府是避免“64 镇压”厄梦的唯一选择。

当时学生领袖犯了致命的错误，他们相信当局为迫于群众的压力而接受他们的纲领。但事实对于当局而言，这就意味着他们不得不与一批新组建的合法化的市民组织、学生联合会、独立工会分享权力，也就是说已经受到重创的专制当局不得不与数以万计的具有经验和自信心的活动分子和“干部”分享政治权力。这也就意味着工人阶级可能进行大规模的行业行动和政治攻势以重新赢得他们在改革开放中失去的一切，要求确保国有企业的国有属性和对于管理层全面监督。

邓小平当局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他们已经看见当时苏联斯大林主义政权所发生的一切，各个民族共和国和不同阶层的群众纷纷挑战中央政府的权威。假如在中国出现类似的情况就意味着政权的崩溃乃至可能国家的分裂。《华盛顿邮报》的记者约翰·派姆弗列特曾指出，“党的领导人担心整个共产主义的大厦都将崩塌。所以他们需要一个立足之地，哪怕是个血腥的立足之地；事实上通过这一方法向他们的国民证明，或者与其说恐吓他们的国民，以使他们服从。”

因此当时中国处于革命或者反革命的边缘之际。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革命的纲领、领导层和党派就是必须的。学生自己组织的领导委员会在运动的最初阶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通过使用大胆的策略和发起一系列对抗法律的示威鼓舞群众的斗志。但形势的发展迅速超越了当时的组织和政治架构。学运的领导层缺乏清晰的政治意识和预测，也未能理解在这种形势上是工人阶级而非学生掌握了关键的力量，同时他们也没有认识到他们所反对的当局会与其采取血腥的镇压而不是轻易让步。

民主诉求

可悲的是，当时并没有一个建立在反对斯大林主义和资本主义基础上的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政党在群众运动中勇于站出来并承担起领导的角色。尽管具有先进意识的工人群众已经察觉到目前的局势由“抗议”演变成与当局进行生死攸关的斗争之时，他们依然期待着学生出面进行领导。在斗争中，他们更愿意把自己看成是学生的支持者而不是斗争的中坚力量。在此我们可以说工人过度重视学生的领导能力，这不是否认学生在这次斗争中自我牺牲和献身的精神，问题是如何正确地制定下一步行动计划并评估其带来的影响。

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将会支持学生们的民主诉求，但同时也会揭露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谓民主原则的迷雾，并警告这将导致走上错误的道路。迄今为止，在资本主义世界的任何地方，群众所赢得的民主权利都是通过大规模的群众压力和斗争才实现的。

社会主义者将给予学生的民主诉求以完全支持，但同时任何会指出这些诉求仍然是有限而模糊的。因为当时更多的不过是“民主万岁”和“人民万岁”之类相当泛泛的号召。而当时的状况要求一个更为明确而清晰的对于前进道路的分析。关于自由结社权利的诉求其实应

“6·4” 1989 ——震惊世界的七周

该相当明确的：社会主义者应该呼吁立即实现所有团体自由结社，只要不是法西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团体，即使是反动的和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团体也应允许建立。社会主义者应该支持新闻自由，这在1989年的运动中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新闻自由就是象贝鲁斯科尼这样的富豪巨头可以通过收买媒体来操纵公众舆论。真正的新闻自由应该是基于由国家资金支持但又不受到任何新闻审查的制度——从而支持印刷刊物和媒体网络的多样化。一个独立的媒体监督委员会应该由民众选举产生从而对整个体系进行监督以防遭到滥用。严格限制私有媒体是确保媒体自由和民主权利的重要保障。

支持民主诉求应该与反对亲资本主义改革和反对损害国有企业的斗争相联系起来。对应的社会主义选择应该是由工会选举国有企业的董事会，而参与董事会的工人代表应该与普通工人拿一样的工资并且随时可以罢免和更换（正如斯蒂芬·乔利在他1989年与北京学生和工人交流时所提到过的）。“太子党”所拥有的财富应该被没收，并禁止任何在社会主义制度选举产生的官员和他们的家属从事商业活动。

一个社会主义组织应该在群众运动中积极地支持和宣传这些诉求，但与此同时也应该提出相应极为重要的问题：如何能够使这些诉求得以实现——通过怎样的政府和社会制度才能实现这些诉求？为此甚至有必要指出学生们要求召开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的不切实际，因为这一政治体制事实上不过是中共高层领导控制下的“橡皮图章”。要求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主张不过是浪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而已。类似的主张还包括，要求改组政府，或者如要求李鹏甚至邓小平等个人的辞职，对于我们社会主义者而言我们认为需要一个完全不同的新政府。在这一形势下，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真正的“人民议会”，一个“革命议会”，这一立法机构将由所有民众选举产生，并对所有的政党开放。这样的立法机构将具有所有政治权力以应对社会危机，——削减行政官员的收入，对腐化的官员进行司法审判，提高工人和教师的收入（这在1989年是个极为重要的议题），增加教育开支，控制物价和提供食品补贴，由选举产生的工人和贫苦农民组成委员会对整体的‘改革’计划进行全面审查，等等。

当学生忙于就他们的诉求进行演说并要求政府“倾听”的时候，一个社会主义党派或者组织应该围绕这些诉求在群众中进行立即和直接的动员。在每一个社区和工作场所都应该成立行动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由工人、学生和普通市民选举产生。这些委员会将真正地包含有民主理想，而且只有他们可以被信任以选举出一个真正的革命议会。

尤其是当戒严令颁布后，这一任务变得更为严重紧急，因为需要协调全国总罢工和群众动员以反对军事干预。而置于这些民主委员会控制之下的人民武装将能够使北京普通工人和市民发起的与进军士兵的对话变得更有针对性和表达团结友爱的精神。但是正如斯蒂芬·乔利解释的，学运领袖反对这一主张，并且拒绝接受来自军工厂工人和同情他们的士兵所提供的武器，因为他们担心这将超越抗议活动原有的框架。但不幸地是，当时采取“升级”行动的想法已经在邓小平的脑海里，运动是完全“非暴力的”本质并不能促使他改变任何想法。在最后一部分的分析中表明，士兵们当时仅仅是不服从命令，但假如他们确信这里存在着由非常严肃的组织起来的人民斗争以试图改变现行秩序，他们会毫不迟疑地站到人民这一边。

也正如林·沃尔什解释的，“假如在过去的6周中存在有工人和学生的委员会，并且他们具有清晰的政治纲领；军队中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力量就会与官僚体系彻底断绝关系并站到人民这边来…。[林·沃尔什，《战斗派》，1989年6月9日]

“6·4” 1989 ——震惊世界的七周

反革命——工人领导的反抗

工人阶级稍晚卷入了这场群众运动，但一旦它介入其中就变成了决定性的力量。但很不幸的是，当时的当局围绕在邓小平周围并成为压倒性的力量准备采取镇压。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是工人阶级而非学生在抵抗军事镇压时起到了主要作用，数以十万计的群众走上街头以保护“广场上的学生”。这也同样可以解释为什么许多屠杀事实上是发生在远离天安门广场的地区。正如斯蒂芬·乔利所评论的，“独立工会的工人们接管了整个计划。他们拥有全城的地图，他们说到：‘军队在这里，在那里…我们应该派工人的队伍去这里，去那里…’年轻的女工（她们事实上在与军队讨论和阻止他们开枪方面是最好的力量）应该派到那里去，因为那里有最凶残的部队。[斯蒂芬·乔利，《见证中国——天安门事件》，1989]

这里值得强调的主要是工人——而非任何其他阶层——勇敢面对屠杀和之后的残酷镇压。许多学生活动分子，包括李民琪和汪晖等人被政府投入监狱或者接受“劳动教养”，但工人们遭到了最严厉的判决。没有学生领袖被宣判死刑，但至少数十名工人被执行死刑。直到今天在网络上仍然能够发现民众中存在的强烈“被背叛感”；因为有些学生领袖在血腥镇压的前后纷纷逃离广场乃至出国流亡，而将其他人留下面对邓小平当局的反革命镇压。

邓小平的“稳定”

通过镇压 1989 年群众运动，中国当局镇压了一场反对斯大林主义官僚体系的政治革命，但由此并没有为斯大林主义的复苏扫清道路而是促进了资本主义制度远较之前更大规模地得以发展。正如托洛茨基对于政治革命的评价，“对（政治革命失败）之后的政治预测有两种可能性，或者官僚体系在工人国家中愈加成为世界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机关，新的（工人国家形式）会被推翻从而使国家重回资本主义制度；或者工人阶级会摧毁官僚体制并开启真正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而中国当时所发生的进程显然有别于其他斯大林主义国家。在东欧和苏联，这一复辟的进程仍然在进行中，柏林墙的倒塌发生在 6 月 4 日血腥镇压的 6 个月后。在东欧，斯大林主义官僚体系中亲资本主义的力量成功地将自己融入到那些反官僚主义的运动中从而确保这些的亲资本主义方向。政治革命以一种所谓的“民主”形式遭到惨败，群众 20 多年来被置于新自由主义和经济震荡中迄今仍然未能彻底得以摆脱。而中国政府在政治革命的开端对此进行了血腥镇压，而且由于镇压是如此的血腥暴力使它赢得了社会“稳定”以确保执行类似的社会转型。（但关于“这一转型的进程已经走了多远，是否这一进程已经完成或者尚未结束”在工人国际委员会（CWI）中仍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那奥米·克兰（Naomi Klein）将邓小平的军事镇压与智利皮诺切特的军事政变进行了比较，“正如皮诺切特的军事恐怖扫清了街头的革命，天安门事件为极端的社会转变消灭了任何群众反抗的担忧…整个国家的民众处于恐惧之中，邓小平得以无所顾忌地执行他的改革。[那奥米·克兰（Naomi Klein），《被动摇的教条》，2007]

这一评论其实是恰当的。6 月 4 日的血腥镇压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个惨重失败，它对于工人进行阶级斗争起到的消极作用类似于 1973 年的智利和 1965 年的印度尼西亚。仅仅在血腥镇压 5 天之后，邓小平在全国的电视讲话中告诉全国人民，“可能这一不幸的事件能使我们继续以更稳定、更好和更快的方式推进改革开放政策…”正如克兰所解释的，“邓小平的行为使这一点清晰无疑，也就是他进行血腥镇压所保护的并非是共产主义而是资本主义。”

“6·4” 1989 ——震惊世界的七周

是否之后邓小平所执行的经济计划就如克兰所描述的一样清晰值得进一步讨论，但很显然大屠杀的制造者们并不准备捍卫计划经济。

有一个广泛流传的说法，“邓小平不惜杀死 20 万人假如因此能确保 20 年的稳定”。事实上整个社会不可能轻易保持整体的安静，但这确实变成了他进行统治的基本教义。在邓小平的“一石二鸟”计划中，一方面他给予胆敢反抗的民众一个教训，另一方面他使党内的反对派如赵紫阳派同情和鼓励学生抗议活动的力量变得小心翼翼。邓小平在这方面进行党内控制就类似于电影《教父》中阿尔·帕西诺所饰演的迈克尔·克来涅一样，他告诉他犯错的兄弟，“永远不要站在反对家族的那一边。”自从 1989 年以来在中共的统治上层内部达成了默认协议不要公开之间的分歧。从此公开表达异见都成为党的禁讳以免获取群众的支持。

在迈克尔·法舍斯（Michael Fathers）和安德鲁·黑金斯（Andrew Higgins）的作品中，他们明确指出使用军队（进行镇压）“并非简单地为了将群众驱散，而是在于制造出暴力镇压的残酷印象以恐吓党内那些对于反抗表达同情的力量。”其中一个意外事例也强化了这一效果，当军队在“中国最佳地段”的长安街上向位于木樨地的 22 号和 24 号“部长楼”开枪时，这些楼里住着当时中共党内诸多的高级干部。“士兵们无差别地向 22 号和 24 号“部长楼”开枪击以恐吓里面的居民就如同象许多其他建筑物开枪一样。[迈克尔·法舍斯和安德鲁·黑金斯，《天安门——北京的暴行》，至少有数名公务员和高级官员的亲属被打死打伤。

“64”镇压之后哪股政治力量得势了？

自由主义者认定的斯大林主义“强硬派”是大屠杀的始作俑者其实是一个错误的观点，虽然他们对于血腥镇压同样有罪。即使赵紫阳的政治势力被排挤之后，在政府内部仍然是“改革派”占有优势。政府当局在 1989 年 9 月将江泽民升任为中国国家主席和党的总书记，此后未久又将朱镕基调任为国务院副总理全面执掌经济。李鹏虽然仍然是总理，但日益成为一个象征性的角色。江泽民和朱镕基都是坚定的改革派，都来自于上海而且手上没有沾上 6 月血腥镇压的鲜血。而且美国的国务院对于大屠杀之后的中国当局会进一步推动市场化没有疑问，他们使白宫相信“新的（中国）领导层将继续推动经济改革虽然在政治改革上会采取更为保守的做法。”[美国国务院调查和情报局，1989 年 7 月 27 日]

西方各国政府虽然对北京政府实施了制裁，但这些措施本身并没有多大影响力，而且主要集中在军备销售上。正如约翰·吉廷斯所指出的，“众多外国政府希望仍然能在中国插上一脚。”

针对当局的特性，李民琪解释了为什么当局中亲资本主义的派别整体上也支持镇压，事实上就力量对比而言当时“改革派”的力量仍然远强于“保守派”。但“改革派”自身针对群众革命运动分成了两派不同的意见。“赵紫阳派”由于担心此起彼伏的革命的浪潮准备与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做出妥协。但邓小平作为“改革派”的领导人深刻理解在当时革命的形势下，任何让步都会从根本上动摇整个体系。而且当时群众提出的“打倒官倒”的口号（官僚通过投机倒把而进行“权力寻租”的一种方法）直接威胁了“改革派”的经济利益。同时邓小平也明确地认识到对于革命的镇压并不会彻底破坏统治阶级与中产阶级的联盟关系。通过给予中产阶级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样一个痛苦的教训，他们甚至会更为紧密地依赖与统治阶级。此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证明了邓小平的判断是正确的。[李民琪，《资本主义发展和中国的阶级斗争》]

“6·4” 1989 ——震惊世界的七周

即使我们不同意李民琪关于 1989 年时官僚阶层已经成为一个‘统治阶级’的分析，但至少他关于斗争的内在联系的分析是正确的。因为事实上自由派的中产阶级，其中也包括部分学生运动的领袖，随着中国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进一步发展也就与当局“和好如初”。

今天的中国相较于 1989 年具有更多资本主义性质而更少的民主。自由主义者所宣扬的建立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需要实现民主被证明是根本性的谬误。但这没有阻挡今天仍然有一些团体还在那里犯相同的错误，呼吁要求所谓的“更资本主义化”或者“真正的资本主义”，将此视为实现民主转变的道路。今天的中国资产阶级在现实中并没有多大的动力要引入西方的议会民主制。由于担心工人阶级潜在的力量和现有的利润体系无法使中国的资产阶级通过提供民众生活水平而“赎买”社会稳定，所以中国的资产阶级在目前的环境下更愿意依靠专制当局提供相应的保护。

中国新一代青年必须充分研究 1989 年群众革命运动的失败从而确保真正民主的理想能在全中国范围内通过群众的游行与斗争得以重新实现。但这次运动将具有一个清晰的目标：民主社会主义！

6·4 之后

天安门广场本身对于中国的群众运动和革命具有“图腾”般的象征意义。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开始，无论是1935年“一二九”运动还是1976年“四五”运动，每一次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群众运动都已成为人心向背的里程碑事件。即使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毛泽东与“四人帮”面对民众悼念周恩来的民主运动也只是动用了上万军警民兵（其中还以民兵为多数）手持棍棒进行镇压，而一贯以“开明”著称的邓小平恰恰就是这场运动的受益者。

所以，直到6月3日，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不仅是北京民众）并不相信军队真的会向民众开枪；甚至于很多人直到当夜士兵向他们射击时，还以为枪膛中射出的只是空包弹或橡皮子弹。这也是1949年革命所带来的“成果之一”和毛泽东政权数十年教育所致，人们无法相信“人民子弟兵”怎么会向人民开枪？当时很多中国民众的潜意识中会将1989天安门运动与1976年的天安门运动相提并论，多认为当局也许会动用暴力将占据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与民众驱散，但“若干年后”会认识并改正错误，这也是无论在香港还是大陆民众一直呼吁“平反六四”的由来。

至于有人为当局辩护说由于缺乏防暴器械所以不得不使用常规武器纯属无稽之谈。当时虽然专业防暴器材数量不多，但在之前镇压西藏叛乱时军队和武警已经使用，而且各方证据都说明38集团军在当晚的推进中，开路的数百人“防暴队”装备有很专业的防暴器械，但恰恰是他们首先在推进过程中开的枪。而且即使专业防暴器械不足，当时各参与戒严部队也确实做到人手配备一根木棒或者钢管。

邓小平所领导的中央军委之所以下达“动用一切手段”也即授权开枪的命令的根本原因是，他们的恐惧。至少在北京当时人民所动员起来的力量已经强大到足以瘫痪国家机器，从4月起北京的警察基本无所事事，就连交通也由学生纠察队负责指挥，而且官方统计显示5月份北京的犯罪率明显下降；在政府失能的情况下，民众已经开始在接管这座城市。也就是说假如当局不开枪，不进行血腥屠杀，不用现代化的武装恐吓，根本无力镇压这场运动和恢复他们所需要的“旧的稳定秩序”。

邓小平当局为进行镇压到底动用了多少部队？迄今说法不一，但10几个集团军20万左右军队是可信的。北京到底有多少普通民众走上街头“防堵军车”更难以计算，但是要將20万全副武装年轻力壮久经训练的军人堵在路上达10多天之久，显然绝非是“一小撮别有用心之暴徒”所能完成的。参考各种资料可以相信在5月底到6月初上街封堵军队的民众人数应不少于50到70万，也就是说不分男女老少约近十分之一的北京市民走上街头参与斗争。与此同时很多资料也表明20多万进京实施戒严的部队中相当多人根本毫无意愿也无斗志进行镇压。

5月19日李鹏颁布总理令北京宣布戒严，其实5月中旬驻扎保定卫戍北京的38集团军部分部队已进至北京市郊。因为北京大学的新生军训都是在38军进行的，所以不少北京大学学生前往进驻的部队进行宣传，很多军人纷纷表示绝对不会与人民为敌。而在6月2日，军委明令38军第二天可以清场开枪的时候，38集团军军长徐勤先装病住院拒绝签署调兵命

“6·4” 1989 ——震惊世界的七周

令；为此徐当即被禁闭，后送上军事法庭，监禁5年迄今渺无音讯。

“萨斯英雄”原总后301医院军医蒋彦永2004年给中共中央当局要求“平反六四”的建言中也明确提到，1989年5月下旬进驻301医院的部队在该院上下的劝说下，明确表示不会镇压学生运动，而当时沿东西长安街各军事单位临时驻扎的部队面临情况大致相同。这迫使军方在5月底6月初不得不将大部分已进入市区但士气大弱的部队撤到京郊轮换新到达的部队。参与军事戒严的部队多数处于这种情况下，军心涣散毫无斗志；有些部队如39军等从6月3日下午到6月4日晚上一直在北京城内以“迷路”为名消极避战。最终根据命令按时到达指定地点的部队只有38集团军和15空降军，也正是这两支部队在6月3日之夜和6月4日清晨开枪进行血腥镇压。

血光之夜

6月3日下午4时由李鹏、杨尚昆、陈希同、刘华清等召开会议下达清场令，要求“6月3日晚9时开始平息暴乱，6月4日凌晨6时结束清场。”根据当局公布的“共和国卫士名单”显示，整个清场过程只有15名军人死亡，且都死于6月3日晚10时半之后，这充分说明死亡军人都是在军方开枪镇压之后，民众被迫反抗而死亡的，而且即使这其中还有为军方自己误杀的人员。各方面的资料显示虽然民众实际死亡人数无法统计但应在数百到数千不等，“天安门母亲”运动迄今统计有实际姓名的死亡人员为188人，其成员目击尸体总和估算不少于1000人；据说就连前国家副主席杨尚昆身前私下承认镇压导致民众死亡人数也有600多人。

38集团军由于军长徐勤先被禁闭后，在军委的威胁和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的监军之下，由政委和代理军长带领为保住性命和职位开始了疯狂的“屠杀之旅”，但即使38集团军中最后开枪的也非多数士兵而是少数的职业特种部队。在清场的过程中，保卫天安门广场的民众与38集团军在西长安街公主坟到木樨地地段和西单到南池子一带发生的冲突最为激烈，多数群众的死亡和受伤也多发生在该区域。根据蒋彦永医生的“六四平反建言”中透露，当时他是位于公主坟的总后301医院的普通外科主任，从晚10点到12点陆续送来需要急救的被枪击受伤人员89人，其中7人死亡；唯一一名受伤的军人也并非戒严军人，而是访亲路过被流弹击伤的。

从木樨地一带一直到天安门前，数千乃至上万工人与市民设置十数道障碍，并以自己的人墙阻止军队前进。根据目击者和军方资料表明负责开道射击和清场的“防暴突击队”绝非是普通士兵，其中没有刚入伍的“娃娃新兵”，并且该部队6月5日就换防离开天安门地区。民众一直传说开枪镇压的部队是“打过中越战争”的部队，北京军区的38集团军未有成编制的参与过中越战争，所以他们很可能是曾经参与中越边境轮战的38集团军直属的特种精锐“侦察大队”。

但民众并没有被屠杀所吓倒，如天安门事件亲历者《1989年天安门广场血腥清场内幕》一书的作者，原中国政法大学研究员吴仁华的描述：“我由衷地敬佩北京的工人弟兄们，他们虽然文化素质不是很高，也不善于辞令，但是，他们却在关键时刻表现出惊人的英勇无私精神。实际上，在八九民主运动中，最具有道德勇气、牺牲最惨重的不是学生，更不是知识界人士，而是北京市的工人弟兄和市民。为了保卫天安门广场，保护天安门广场上和平请愿的学生，他们一直在用血肉之躯阻挡著武装到牙齿的解放军戒严部队，浴血奋战，奋不顾

“6·4” 1989 ——震惊世界的七周

身。他们绝大多数人手无寸铁，少数人手中仅有的‘武器’，也无非只是些砖头石块和棍棒而已，与戒严部队军人的冲锋枪、机枪以至于装甲车、坦克相比，显得多么地微不足道！”

同样作为事件亲历者的工人国际委员会（CWI）代表斯蒂芬·乔利在其《见证中国——天安门事件》一书中也提到，“成千上万的工人跟在（开枪的部队）后面，他们手无寸铁，其中一些还是女工，有些人骑着自行车。数千名工人跟在部队后面却没法和他们作战，他们只是唱国际歌。部队后列的人不知道怎么办，士兵偶尔会开枪，大家会趴下，但你不知道有多少人被杀，因为他们每次又爬起来，死去的人躺在地上。人群就像沙滩上的海浪一次次地涌上来，他们只是唱着国际歌。”

即使在 38 集团军屠杀过去之后，民众仍然没有放弃抵抗，继续在长安街上设置路障和阻拦后面的部队。据空军副政委刘亚洲在成都军区的内部演讲《信念与道德》中透露，“6 月 4 日凌晨，跟随 38 军的 28 军在长安街上遭遇市民阻拦，军长和政委命令部队就地停留一天未动。”根据吴仁华的文章，当时市民用从医院取来的血衣向士兵证明之前经过的军队（38 军）确实向民众开枪后，28 军的官兵表示震惊并拒绝服从任何命令，甚至在 6 月 4 日白天当军委派直升机强令军队“不惜代价继续前进”的时候，28 军一辆装甲车上的士兵（一说是退伍军人）用机枪向直升机扫射。

午夜过后 38 集团军进入了天安门广场开始血腥清场，本来在广场内杀人还是广场外杀人并不重要，但无论是吴仁华还是斯蒂芬·乔利的书中都提及了军队确实在广场上向人群开枪并出动坦克和装甲车碾压广场上的帐篷。而且 6 月 4 日清晨在六部口附近 38 集团军的坦克甚至碾压已经撤离的学生队伍。

吴仁华在书中描写，他亲眼目睹三辆坦克从天安门广场方向开过来，一边发射著散发出淡黄色烟雾的毒气弹，一边沿著正行走著数千名学生队伍的自行车道快速地追碾过来。一时间，长安大街上弥漫著淡黄色的烟雾。当时他和数百名学生为了躲避坦克追压，纷纷拚死翻越绿色尖头铁栅栏，欲进入邮电大楼的大院子暂时避难，而把门的武装警察竟然紧闭大门，拒绝让学生们入内。待坦克过去，比吴仁华所处位置稍后的学生们已惨遭不幸，11 名学生当场惨死坦克轮下。

而斯蒂芬·乔利的书中也说明了这一情况，“星期天早晨 6 点左右，我回到了天安门广场。……有一次，部队对学生使用催泪弹。学生们逃开了，许多人试图爬过栅栏。有 11 位学生没有爬过去，之后坦克过来了，沿着栅栏碾过去把他们碾死了。他们再一次露出来的时候，已经像火柴盒一样平坦，他们死了。”

可能吴仁华没有看见或者出于不渲染群众暴力的目的，而没有提及斯蒂芬·乔利还继续描述的内容，“但那辆坦克与坦克群脱离了。工人们包围了它，那情形就像一只死老鼠上爬满了蚂蚁。他们扳掉坦克的盖子，里面有一名指挥官，不是一个普通的坦克驾驶员。他们把他拖出来，对他进行殴打，然后把他活活烧死，这些就像我们在 1984-86 的南非起义中看到的一样。然后他们把他挂起来向远处的部队示威，警告他们。事实上，一旦大屠杀开始后，人们试图控制局面，但他们现在别无选择，在这个阶段是没有任何其他办法的。”当时血腥镇压已经很明显，民众除了反击别无选择。

另一支开枪清场（主要开枪地点为珠市口）部队是当时中国唯一一支快速反应部队空降 15 军。据传从 5 月中旬起归属南京军区的 15 军士兵们就一直处于隔离中，十数天没有看到报纸也没有收听广播，只在登机出发被告知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需要武装镇压。根据斯蒂

“6·4” 1989 ——震惊世界的七周

芬·乔利在《见证中国》一书中记录与法国记者的交谈显示，15军士兵们可能还给注射了确保清醒和警觉的肾上腺激素。2008年5月12日四川发生汶川大地震，15军作为紧急预备队被调往四川救灾。面对总理温家宝的百般催促但官佐们迟迟不肯伞降，被网友讥称“犯我中华天威者只要天气晴朗无风无雨，能见度高，地形不复杂，地面无人烧麦秸杆，虽远必诛…”；最后温家宝无奈之下也只能当着国内外媒体给15军扔下一句，“人民养着你们，你们看着办！”。20年来，曾经的“人民解放军”在民众中的声誉日降，1989年的血腥镇压加上之后20年资本主义的复辟，军人贪污违纪屡不胜数。“500元一张党票，50万一个团长”几乎成为军中的惯例。这支80年前曾经由一批具有朝气和理想的知识分子和被压迫最为深重的农民阶层组成的“人民军队”，如今全然忘记自己的传统，也不知该为谁而战。

镇压之后的反抗

但即使在血腥镇压之后，群众并没有因此而屈服；相反当局在之后的近一周内几乎处于失能的状态。6月4日当天，北京各主要媒体包括《人民日报》、中国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等国家媒体的工作人员纷纷采取消极不合作的方式抗议当局的军事镇压，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英文广播甚至在6月4日明确表示因为“血腥镇压”而集体罢播。

根据《六四真相》一书记录，在6月4日北京镇压的消息传出当天，全国63个城市发生群众抗议。上海从6月4日到6月9日，数万学生与工人在全市范围设置路障，并在人民广场和市政府集会抗议召开悼念死难者的追悼会，6月6日数万学生市民在铁路上卧轨阻拦从北京南下的火车发生著名的“光新路事件”；从6月3日到6月9日，上海工业生产大幅减产，数十家工厂停产，工业用电量下降15%，全市交通受阻；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不得不发表公开电视讲话以示妥协，“上海不能乱，但上海市绝对不会军管”。

6月4日，成都中心广场武警与上万抗议的学生和群众发生冲突，冲突持续一天时间，广场周边派出所和数十辆警车被群众焚毁。哈尔滨、天津、长沙和广州等市类似抗议不断。

正如斯蒂芬·乔利在他《见证中国》一书中所描述的，当时很多国内民众和海外媒体都以为是27军在清场当晚开的枪，人们无法相信军长抗命的38集团军（而且对中国人而言，38军具有特殊的意义，他们曾在1950年代朝鲜战场上因成功抗击美军而得名“万岁军”享誉全国）会向平民开枪。因为蒙受这“不白之冤”，从6月5日直到6月9日，27军在河北石家庄的军部遭到数千学生与民众连番冲击，而且地方上的单位与群众自发断绝向27军提供后勤供应。为此当27军回到石家庄驻防后，从军长到连长一级级地向地方政府和群众解释保证27军在北京没有“向首都人民开一枪”。这使同样驻扎在河北的进行血腥镇压的38集团军极为被动，并导致之后两军的长期交恶。

后据统计，当时陆续到达北京的集团军约有14个，但其中很多是用来互相钳制的而非真正用来清场和戒严，特别是在出现38集团军和28军集体抗命的情况下，邓小平不得不在6月3日连夜从南京军区将其心腹机械化12军调到北京以防其他军队可能进行军事政变。直到6月9日，邓小平公开接见进京戒严部队并进行电视转播时才意味着当局真正重新控制局面。虽然在89年曾经一度宣传“平暴胜利”并公开嘉奖戒严部队，但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所有相关宣传嘎然而止。十来年中，中共高层，无论是邓小平、杨尚昆还是李鹏等人纷纷通过家人或者出书的方式撇清自己表示自己没有下令开枪，而参与戒严的部队官兵甚至要求从档案中剔除关于自己参与“64”镇压的记录以免被周围的人另眼看待。而官方宣传中“反

“6·4” 1989 ——震惊世界的七周

革命暴乱”也被称作“政治风波”。当权者开枪了，却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承担这一历史责任，他们所能选择的方式只是遗忘。

据不完全统计，自6月起中共当局持续整整1年对社会上反对力量进行镇压，有4万多人被逮捕，5000人被判刑，100多人被处决。根据官方法律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法律年鉴》的统计显示，1989年以反革命罪收案为572件，1990年为716件，总计1288件，其中绝大部分都与1989年的群众运动相关；而1987、88和1991、92共4年以反革命罪合计收案不过1171件，后两年中部分案件事实上也与1989年的有所关连。最终遭到长期监禁乃至处决的绝大部分都不是学生领袖和知识精英，而是最普通的工人和市民；相反不少著名的民运领袖却得以轻判或者出国躲避。据说王丹在国内被通缉躲藏期间，一个普通餐馆老板仅仅因为给他提供2顿免费饭菜被关数月。据信迄今仍有约百人由于“64”镇压被关在狱中，而很多即使出狱的普通工人和市民也生活艰难，妻离子散。

在6月3日晚上和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是一些最最普通的北京工人和市民在血腥镇压的最后关头勇敢地站出来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反抗暴政，为1989年群众革命运动写就了不朽的篇章。

“64”之后

正如马克思对于1848年欧洲革命的评论，“1989年群众运动的主要成果不是中国人民赢得了东西，而是他们失去了东西，——他们丢掉了幻想”。

“64”之后，中国民众既失去了“假平等”也没能赢得“伪民主”。1989年之后的20年里，1949革命所赢得的诸多社会成果几乎丧失殆尽，同时民众也没得到少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精英所吹捧的“市场经济下的资产阶级民主”。正如莫里斯·迈斯纳在《邓小平时代》一书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是被中国人民所珍视的。它不应是一种仅仅由学生和知识分子所执有的观念。中国人对民主权利的要求萌发于世纪之交，而后迅速从革命知识分子和学生传向城市大众。”

1989年运动从一开始缺乏重要的成功因素，群众与领导层互不了解对方的动机和立场，更谈不上整场运动拥有明确的目标和策略。处于斯大林主义一党专制政权统治下的工人阶级与民众需要的是一场政治革命，是在仍然保证原有的国有计划经济体系和全民社会保障的情况下，结束一党专制，允许自由结社；并停止已显露邪恶的资本主义“市场改革”；这应该是一场真正的社会主义政治革命，而非是某些亲资本主义知识分子所希望的“西方化的民主”。在这里谈论民众在运动中是否需要“保持理性和忍让”或者要遵守“现存国家的法律和秩序”毫无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与法学家的幻想相反，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有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不顾社会发展的新的需要而保存旧的法律，只会造成社会危机。”

1989年运动的领导核心是小资产阶级（或者资产阶级化的）精英知识分子，他们所具有的天生软弱性使他们无法独立承担政治任务，往往最终会与统治者媾和，更由于他们在根本的经济政策与意识形态上与当局导向的合拍，使整场群众运动最后被“无意识地”血腥葬送。他们从一开始就想尽办法将普通民众排除在外，害怕群众会超越他们所设定的种种目标；而后又不得不依赖于群众的力量以压迫当局作出让步。每一步反应和“正确的决定”都是在犹疑不定中被迫做出的。4月时学生排斥工人群众参与游行如此，5月拒绝总罢工也是如此；

“6·4” 1989 ——震惊世界的七周

而当军事镇压已经不可避免之时，却仍然寄望于“改革派”上层官僚在权力斗争中胜出和坚持所谓的“和平理性”的斗争。在形势有利的时候，坐视时机白白错过，在形势恶劣的时候，不知变通又手足无措，反使民众和自己成为了镇压的牺牲品。

如何理解 1989 年的运动对于已经死去的、曾经斗争过的乃至今天仍然在坚持斗争的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假如我们不能真正认清和了解 1989 年群众革命运动发生的前因后果及其对我们和整个世界的影响，我们根本无法理解这 20 年乃至 30 年中国社会的变迁，我们也无从认识和探知中国在这个新世纪的走向。“64”那夜的血就象“禁忌”一样深深地封存了人们的记忆，整整一代人尤其是其中的所谓“精英们”被折断“脊梁”沉迷于金钱和堕落之中。在当局谎言的层层涂抹下，对于中国新生一代的青年来说，“1989 年”、“64”和“天安门事件”就象从未发生过一般，他们从出生起就患上了“先天失忆”。

但无论多少谎言都无法掩盖真相。事实是 1989 年运动之后，20 年来中国所出现诸多热点事件，每一次体制内外的突破和镇压，最近的如《08 宪章》、《新京报》回收、《读书》更换主编、“新毛派”的崛起、“爱琴海”网站被封、《冰点》停刊，每一件事以及这些事件背后的人都最终可以追溯到 1989 年的那场运动和 6 月 4 日的那个凌晨。而中国各地所发生的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工人罢工、农民骚乱还是市民抗议也好，“64”的血都成了摆在人们面前一道难以跨越的心理障碍，——“他们（当局）杀过人，他们会不惜再杀人”。“64”成为了所有中国人无法饶过的一道坎，假如不能正视 1989 年的运动和“64”的镇压，那么中国社会的突破与出路也无从谈起。

新的选择

1989 年 6 月 3 日到 4 日及之后的一系列血腥镇压使工人阶级反对一党专制官僚国家体系的政治革命的尝试还未开始就已经失败。这其中固然存在诸多原因，但根本原因在于在斯大林主义的畸形工人国家中，长期受官僚体制压制和扼杀的工人阶级缺乏真正的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指导的政治纲领，缺少由工人阶级自组的民主的独立工人组织和工人政党，自然也无法使工人阶级在当时条件下拥有进行政治革命的正确战略。

官僚阶层或依赖于工人阶级，或依赖于资产阶级以维持自己的统治。当旧的毛泽东时代专制官僚体制变得声名狼藉，而同时被扭曲的计划经济体系也失去活力；尤其是毛泽东 1976 年死亡之后，中国的斯大林主义官僚政权在邓小平的领导下 10 多年来“尤抱琵琶半遮脸地”进行着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和一党官僚体制下几乎是明火执仗的“贪污腐化”，这最终导致民众为追求民主平等和经济保障而爆发 1989 年的群众运动。

中国学者汪晖将 1989 年中国的群众运动与之后 1990 年代末和 21 世纪初欧美所爆发的反全球化运动联系起来固然可能有“过度诠释”的嫌疑；但 1989 年中国当局对群众运动的血腥镇压，与整个苏联和东欧地区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分崩离析；和世界范围内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急歌猛进”确实存在着内在的相互呼应。而这种世界性政治经济局势的变化更使中共官僚政权为维持自身权力和特权而“别无选择地”（或者说“‘欲’无反顾地”）将资本主义复辟进行到底。

“89 的血加 92 的蜜，即使圣人也会变恶魔”。资本主义制度的卷土重来与一党专制官僚体系的倒行逆施，终于用最肮脏的“权贵资本主义”的土壤培育出了“中国经济奇迹的曼陀罗之花”。而这一“经济奇迹”建立在如下的代价之上：中国在 30 年内从世界上收入最

“6·4” 1989 ——震惊世界的七周

平等的国家之一变成了世界上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占全国家庭总数0.4%的150万个家庭控制着社会总财富的70%，当2008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继日本之后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的同时，中国仍然有超过2.6亿人每天生活费用不足1.25美元，是仅次于印度之后世界贫困人口第二大国。2.6亿农民工多在如同劳动集中营般的“血汗工厂”中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6000万辛劳一生的国企下岗工人被榨干抛弃；在为世界最知名品牌生产的流水线上有着300万被奴役的14岁以下的童工。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崩解带来的结果是：教育产业化导致2个农民一年不吃不喝的收入供养不了一个大学生，而靠卖房卖血培育出来的大学生却是毕业即失业；医疗产业化结果导致60%的农民因无钱而放弃看病，垂死的老人在太平间中度过人生最后的日子；住房产业化导致中国住房私有率甚至数倍于欧洲国家，2倍于美国；即使所谓的“城市高薪白领”也因上数十年的债务成为“蜗牛房奴”。

不仅1949年革命所带来的并不完善但相对普及的社会成果丧失殆尽，也使1990年代之后中国民众极为混乱的意识形态极端化地向两维扩张。假如说今天仍然身披“共产主义”外衣的当局所执行的政策都是历史必然的话，那么1949年革命本身的意义何在？

在这一思维纬度下本来早已死亡的国民党政权反而具有了某种“借尸还魂”的道统性，在民众尤其是一部分青年人中形成了所谓“亲三民主义的泛蓝派”，但他们全然忘记了国民党腐败政权的垮台并非是来自“外国的阴谋”或者“土共的狡诈”，而是数万万中国人在贫病交迫和恶性通货膨胀之下的必然选择。

假如说今天中共当局所执行的政策都是错误的，由此仿佛得出的结论也就是1949年革命基础上建立的毛泽东政权显然是“唯一合法的政权”，毛政权相对清廉的斯大林主义一党专制官僚体系和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反而吊诡地变成理所当然，在青年中因此产生了相当部分自居革命的“红色的毛泽东主义者”，但即如此，为什么毛政权在造成民众的惨重损失和政治信仰空洞后，在1970年代无法继续运转下去？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现中共当局在岌岌可危中保住政权与特权却失去了“统治基础”。今天能维持其统治的只剩下两件主要工具：恐吓与利诱。暴力的恐吓只有在人们相信暴力可能带来的后果时才会起作用，而并非在于暴力事实上的实施；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当暴力一旦频繁地实施，那么恐吓所能起到的效果也会逐渐减弱。根据官方统计在1989年血腥镇压4年之后，1993年中国的群体性事件不足1万起，到2006年该数字达到9万起，而最新统计的2008年数字则已经突破了12万起。在此期间当局的镇压手段越来越先进而且投入的资源越来越多，但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则明显呈线性增加，无论是2008年6月28日发生在贵州省的“瓮安事件”还是今年3、4月间发生在河北省保定的“依棉工人罢工事件”都反映出群体性事件越来越“组织化、持续化、扩散化”的趋势。当局暴力恐吓的吓阻性正日渐衰弱，越来越多的时候官僚当局不得不采用暂时的妥协和牺牲部分权益以平息事态。

利诱是否能成功取决于现实的经济利益与远期的预期收获。“稳定”曾经成为中共当局手中的一张王牌，而这又与20年来的经济快速增长密切相关。当局一直以来“循循善诱”劝导民众，只有“稳定”才能保住你们到手的“面包”，也只有“稳定”才能在未来“可能分到更多的面包”。但问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规律导致的必然贫富分化，使越来越多的民众被排挤出“享受经济高速增长成果”的队列中。无论是农民、农民工还是城市工人在过去的20年中实质收入增长远远赶不上经济增长的速度甚至出现实质性下降；但同时民众看见的却是富者愈富和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手中集中的趋势。而且在新世纪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下，惨淡的资本主义制度前景更难说会给民众带来什么远期的预期收获。

“6·4” 1989 ——震惊世界的七周

特别是在彻底抛弃意识形态和失去政治信仰的情况下，官僚体系内部也只有依靠特权和利益的诱惑才能勉强维持统治；中国官僚和权贵精英们所承袭的“集数千年之大成”的贪污腐化和道德堕落在今天已经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套用中国网络上的流行语就是“他们没有突破不了的道德底限”和“处级干部两个当中枪毙一个，肯定会有漏网之鱼”。

但社会资源总是有限的，随着官僚与资本家越来越欲壑难填，就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生的统治基础“中产阶级”也日渐不堪重负。“稳定”所能带来的“现实经济利益”和“远期预期收获”与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毫不相干，故越来越缺乏现实意义，“稳定”本身也渐变得无足轻重，这同样可以通过群体性事件数量猛增得到佐证。

莫里斯·迈斯纳在《邓小平时代》一书的结论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未来，如果还存在这样一个未来的话；它将不会来自于现有的社会和政治体系的演化，而更会来自于民众对现行体制的集体性反抗。它不会是市场经济成熟的结果，而恰恰相反会来自于（民众）民主斗争以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社会后果。就历史而言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天然对手，而对于中共一党专制政权的抵制将会同时具有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特征。因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已经无法分割地与这个国家体系和它的官僚机关纠葛在一起，这样一场社会主义的斗争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与现中共当局的冲突。”

托洛茨基在《不是工人国家，也非资产阶级国家？》一文中论述，“官僚垄断权力乃至生产力的停滞尚未自动更换社会及所属国家的阶级性质。谁能改变这一性质？只有一种手段——革命或反革命暴力对财产关系的干涉。”假如没有“64”的血腥镇压，中国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就很难获取胜利。同样出自上文，“假如资产阶级反革命获胜，复辟当局将被迫暂时依靠国有经济。‘政经分裂’是各种社会转折的必经时刻。”在“64”血腥镇压之后的二十年内，虽然曾经在1989年到1992年出现阶段性的“经济改革”进程的停滞或被外界认为是停滞。但事实上很多市场化的“改革”仍然在进行中，而且所谓的中共保守派在是1989年之后被彻底赶出了政治舞台。而迄今整个国家机器仍然是波拿巴式的一党官僚体制。但无论是1992年进一步推动市场经济改革、对外贸易体制和汇率体系的放开、还是2001年加入WTO、乃至2002年对党章的根本性修改并允许资本家正式入党，都意味着中国整个社会和经济体系的资本主义复辟进程。

换言之，在目前的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现实途径只有彻底终结现存的已经全面采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波拿巴主义的一党官僚国家体制。正如托洛茨基在《总结与瞻望》说提到的，“国家本身不是目的，但却是组织、解散和改组社会关系的最大工具。革命是社会力量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进行的公开较量。”每一场新的革命都起始于实现上一场革命未能完成的任务——扫荡残存的旧有的反动力量，而它是否能实现自己的最终目标又往往受限于上一次革命所达成的成果。但对中国而言，这将不再是一场本应发生在1989年的一个“畸形工人国家”中的一场政治革命，而是一场对中国社会的经济体制和政治秩序进行彻底性变革的社会革命。尤其是在21世纪全球性资本主义危机条件下，中国的革命将重新提到历史议程之上；这场革命则应该也必然是一场由中国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民主地、自下而上地、以计划经济为根本生产方式的、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并且作为世界革命一部分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只有这样一场革命才能使今天的中国摆脱重重危机，使中国的工人阶级和所有受压迫阶层真正掌握历史发展的方向，并最终推动整个人类社会向前发展。

见证中国——天安门事件

我在中国亲眼目睹并亲身经历了这场发生在一个拥有世界上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度的政治运动。虽然他们的政治经验和组织经验仍然略显幼稚，但我深感很有幸能与北京和上海等地的工人和学生进行交流。并且，我不得不说没有什么能比我所亲眼看到的更令人感到震惊，这是我从事政治运动以来见到的最为壮观的事件。

在大屠杀发生前的一个星期天我到达北京，也就是五月最后一个星期天（译注：5月28日）。刚安顿下我就直奔天安门广场，此时一场规模庞大的游行正在进行中；为此要进入天安门广场本身就如同一场“战斗”。

这场游行大约有20万人参加（我后来才发现，有些学生们对于这样规模的游行仍然感到不够满意）。由于是星期天，许多工人们不上班，他们主动加入到游行队伍中。游行队伍沿八车道的主干道（译注：长安街）行进，数公里长的队伍一眼望不到尽头，队列中到处都是写着中国字的红旗。其中有代表钢铁工人的、大学生的、教师的等等，大家都齐声高唱《国际歌》，高呼反对当局的口号。

我想此景象足以揭穿斯大林主义的中国当局所制造的谎言，而且这些宣传也为西方资本主义媒体广泛采纳；这就是他们都异口同声地声称中国所发生的这场大规模群众运动是一场“反革命的”或者“亲资本主义的”运动。但事实上从运动开始到结束，我没有遇到过任何一个学生、工人或者农民向我表示希望这场运动能在某种意义上或某种形式上推动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发展。

天安门广场

我花了三个小时才到达天安门广场，说实话那里的景象真让我大开眼界。北京的中心——残酷的斯大林主义当局统治下的天安门广场——像是正在诉说什么。它如此之庞大，可能有四到五个板球场或五到六个足球场大小。最有意思的是广场中间的石碑，它就是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毛泽东曾经多次在广场上讲话，过去许多大型政治集会都是在此举行。但今天的天安门广场被大量的帐篷所占据，这些帐篷有的是中国国内生产的，也有来自香港或者西方国家的捐助。帐篷里仍然住着一些绝食学生，虽然大多数绝食者已经结束了绝食。

天安门广场的北头是紫禁城，（天安门城楼上）高高地悬挂着毛泽东的画像注视着下方。我不知道当他看到在他面前发生的这一切的时候是怎么想的？（这是北京城内仅存的一幅大型毛泽东画像。并且，在青年人的脑海中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对毛的印象。）很显然，在毛去世后，中国的官僚们发动了一场反对毛泽东的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成为了毛泽东的一个污点。毛的妻子（译注：江青）及其他“四人帮”成员无疑遭到政府和普通百姓的痛恨。但有些老工人还依稀记得刚刚解放之时（共产党政权）与今日的大大不同。相对于今天，当时官僚们受到更多限制，腐败问题也少得多；而如今人们却经常可以看见高级官僚和军队大官们开着高级轿车在北京城中横冲直撞。

“6·4” 1989 ——震惊世界的七周

尽管天安门广场周边东、西、南三个方向的建筑非常雄伟，但是相对于广场上大量的人群而言，又显得很渺小。

我觉得我仿佛正处在世界的中心。你每天可以从电台、报纸和电视，从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看到、听到天安门广场上的工人、学生和农民。在这里几乎聚集了当今资本主义世界所有新闻媒体的精英们，但更重要的是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中国学生中的精英和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中的无产阶级精英正汇聚在此进行抗议。

当一到达我就急切地想要去找现场的人们谈谈。起初，我非常担心：我要如何去了解他们？你在学校里一定曾经听到许多关于“竹幕”的故事，你想知道作为来自地球另一面的人你能够做些什么。而你对中国又有多少了解呢？显然他们的所作所为绝非儿戏，他们正在进行绝食抗争并冒着被镇压的危险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到这场运动中来。他们正在感受残酷的镇压，并将在一周后感受到更为残酷的镇压。

但一旦走进帐篷的时候，我的恐惧和担心就变得无影无踪了。在走进的第一个帐篷里，我见到一些从上海赶来的学生，他们已经在这里好几天了。真是很幸运他们中的一些人能够说英语。我坐下来，他们问我，“你是记者吗？”

我说，“不，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是来自西方的社会主义者！我来这里就是想要直接听你们讲讲发生的一切，因为我不想倚赖资本主义媒体的记者报道来获知你们的情况。我要听到你们自己的叙述。我要让你们知道通过斗争，你们已经征服了全世界的工人和青年的心灵。我们希望能向你们学习，你们为我们指出了一条前进的道路。同时我也想与你们交流经验，因为我们在海外的政治经验和组织经验或许会给你们一些帮助。”

狂喜

我一旦表达有人支持他们的观点，你可以明显看见他们的狂喜。他们拿出小板凳让我坐下，并且使劲地给我让烟，几乎把烟卷放到我的嗓子里了。当然，我还是坚决拒绝了他们的这种热情。他们还热情地给我拿来冰凉的饮料。你要知道当时学生们是多么贫穷啊（稍后我再细说这方面的内容）。尽管他们已进入大学，但从经济状况上说并不属于特权精英阶层的一部分。这些学生，有些人正在绝食中；但他们对待我就象对待国王一样，就因为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我愿意支持他们。

当我开始交谈的时候，又有数十人围到我的身边；这时帐篷里已经塞满了五十几个人。要不是容不下本来还会有更多的人；幸亏我坐的比较低，否则人们根本听不清我说话。这不由地让我想起约翰·瑞德的著作《震撼世界的十天》（译注：美国记者和社会主义者约翰·瑞德撰写的关于亲历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书籍）。而目前我所经历的现实甚至超过了他书中的描写，因为我并非作为记者来到这里，我是来这里学习的也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组织方法来帮助这场运动。

在讨论中，他们向我描述了过去几周所发生的一切，以及学生运动在中国全国越来越受关注的情况，并且也探讨了他们对于未来的分析和预期。他们另外很关心我能给他们提供什么样的帮助。他们谈到：“我们已经得到海外大量的资金支持，但是我们需要比金钱更重要的支持，尤其是思想的支持。这是你们能帮助我们最好的方式”。相同的内容在之后的其他讨论中也被多次地提起。

“6·4” 1989 ——震惊世界的七周

就如同与上海学生的对话那样，之后我也曾不断对其他人重复相同的观点，“我简要说一下你们需要做的第一点，大家都要明白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联系的重要性，依赖学生本身的力量不可能赢得这场斗争。”接着我谈到了工人阶级领导权的问题，讲述工人阶级必须领导这场斗争的原因，以及学生们应该利用每一个可能的机会在运动中逐步向工人阶级靠拢并努力促成建立独立工会的运动。因为它是取得胜利最为关键的因素，这不仅仅是对于工人，而且对于学生本身也是如此。我们又谈到了这个问题，即为什么 1917 年工人阶级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不同于中国革命，这是因为 1949 年的中国革命并不是由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

我们要谈的第二点就是这场运动的落脚点，即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的真正要求和纲领应该是什么。我认为有必要将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联合起来一起推动整场运动向前发展。我们应该坚持列宁反对官僚主义的四个基本观点：所有官员由选举产生、官员的工资收入不应超过技术工人的收入，实现新闻自由，反对一党专政，给与所有坚持计划经济而又保持独立性的普通民众自我组织和自由表达的权利。我们强调工人武装的必要性，但这绝不是依靠六、七个武装起来的工人把邓小平或李鹏拉下台的。我必须承认，学生中还存在一些恐怖主义的思想。只要不是进行全民武装的想法都应该坚决摒弃的。我们不需要一支“人民的解放军”，而需要武装的全体人民，这才应该是我们的目标。

斯大林主义体制下的民主改革？

关于我们讨论的第三点，……我必须说，这是在讨论中最难以被接受的一点，尽管在十次讨论中有九次最终我们的观点得到了支持。具体的问题是这样的：有没有可能在斯大林主义的中国，甚至苏联或者东德，通过正确的纲领利用强大的工人运动或学生运动从斯大林主义政权那里争取到民主权利？因为那些上海学生以及其他学生还有工人都对我说：“我们认为这是可能的。你们看看苏联今天所发生的变化，看看波兰正在进行的选举，再看看西方国家，你们的资本主义制度是比我们现行制度更糟糕的制度，但是你们拥有民主权利。我们在一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难道不能拥有民主权利吗？”这些问题都有必要从理论上给予他们圆满的回答和解释。

顺便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是透过中共官方的新闻媒体 学生对外面的世界了解并不少。至今由于中国的官僚当局与美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的利益冲突，他们了解美国黑人所面临的情况、美国存在的大规模失业问题和贫富悬殊。他们还报以同情地分析巴基斯坦政权以及智利独裁政权，因为这些都是中国的官僚政府所支持的外国政权。中国政府的报纸也引用了大量国际上各资本主义媒体的相关资料。

中国的官僚体制

尤其是，他们了解许多关于东欧和苏联的讯息。邓小平及其领导的官僚们基于本身的利益，鲜明指出苏联的民主改革所存在的问题。他们认为这对统一百姓的思想有很好的效果。大约两个月前，邓小平对官僚中的精英分子发表了重要讲话。据香港报纸报道，“现在我们有二个选择”，他说，“我们可以走戈尔巴乔夫的老路，但对于一个 10 亿人的国家相当于玩火。看看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已经带来的问题，他实实在在地发动了一场反对自己的运动；他觉得自己很聪明，其实不是。在中国，除了保持头脑清醒和维持现状我们别无选择。譬如说，假如我们为能确保对十亿人的统治，就是杀死 100 万人也没什么关系”，在这一点上邓

“6·4” 1989 ——震惊世界的七周

同旧中国的帝王们对普通百姓的蔑视没什么两样。

尽管中国官僚当局拒绝走戈尔巴乔夫式的道路，但是如今其仍然不得不面对眼前的运动。无论如何，我们试图回答在斯大林式的国家实现民主改革的可能性的方式就是这样。首先，中国的国情与西方不一样，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可以通过拥有的生产资料来操控国家的经济。它通过国家机器拥有政治权力。在面对强大的工人运动时，资本家有时会被迫接受一个工党政府，甚至是一个左翼的工党政府；即使左翼的工党政府能组建内阁，但对资本家而言只要他们仍旧能够对政府发号施令和控制社会经济就足够了。例如，澳大利亚目前的局势就是如此。

我在讨论中说明，只要拥有强大的劳工运动和工会力量，争取基本民主权利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是可能的。但同时我又回顾了之前所说的，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事实上只有15%的人口拥有所谓的民主权利。不过，他们也是通过斗争才赢得权利的。我提及了例如历史上争取妇女参政权运动，女工在英国是如何赢得选票的。19世纪50年代澳洲的尤里卡寨工人暴动，澳州工人阶级获得选举权。选举权不会由（统治者）放在盘中白白赐与的。

同时我说明在斯大林主义政权控制的世界里问题是完全不同的。为什么呢？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后和中国1949年革命后，经济上已经实现国有化；官僚们取得了国家政权。国家的全面控制是经济调控的主要杠杆，因此，对于官僚们而言，如果失去国家政权他们将失去特权，他们将变得彻底的血本无归。就邓小平本人而言，今天如果他失去了政权，甚至可能会被吊死在最近的电线杆上。因此，中国的官僚们将不得不对工人阶级和学生争取真正的民主权利的运动进行坚决镇压。

诉求

一旦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并且在理论上接受了我们的主张；那么我们不得不要问我们自己由此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结论其实很简单。当前我们所应提出的诉求将是一系列基于过渡纲领的过渡诉求，包括列宁的四点基本主张，培育和建立独立的工会运动，进一步发展的学生运动，并将之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等。与此同时，不仅对于运动的领导人来说，对普通的工人和学生来说，只要存在任何值得忧虑的可能性，隐瞒所必须面对的可怕事实都是绝对错误的：现实是在中国，工人和学生的要求不可能从在中共当局和它的治权之下所获得。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学生们谈到，是否可以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改革派，赵紫阳是否可以依靠？其实对此抱有幻想的学生和工人不到西方媒体宣传比例的一半，尤其是在比较活跃的工人和学生中更是如此；当然这种情形也的确存在。因此，我们讨论了波兰的形势：选举并不代表波兰社会民主化的开始。导致此现象发生的原因是（a）因为波兰团结工会的领导人瓦文萨被雅鲁泽尔斯基和波兰政权训的服服帖帖（B）因为他们进行的仅仅是非常有限的民主改革，而并非是把真正的民主权利和权力归于人民。这也就存在这么一个问题，官僚阶层表面上进行有限度的改革来设法防止自下而上的革命。我还指出在苏联在进行改革的同时，公开地镇压格鲁吉亚的群众运动。由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任何学生和工人的纲领都应该关注如何建立一个新政府、一个新的革命政府，从而实现一场政治革命，而这也正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所必须做的。换言之，工人和学生需要接管政府的权力。事实上，只有如此，变革才可能实现，并能永久地实现变革并真正关注中国最广大群众所关注的问题。一旦这一结论得到认可自然

也就推导出进行组织建设的问题。

而之后一切变得更容易了，因为大多数的学生和工人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都有一定的了解。虽然没有多少人知道托洛茨基。有时通过讨论苏联斯大林所进行的政治反革命及其在中国的发展也使得全面地讨论托洛茨基主义的影响成为可能。斯大林式官僚制度在苏联的错误政策究竟有哪些？而由此对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到底有什么影响？它又是如何导致中国 1925-1927 工人革命的失败？毛泽东是如何从依靠城市工人阶级倒退回依靠农民阶层的？为什么说中国 1949 年的革命并不是由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等等诸多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完全不复存在了。我解释了托洛茨基在俄国十月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尤其是他的领导作用，他是如何与列宁同志一起在 1917 年高举革命的旗帜。同时我也解释了托洛茨基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之间的关系的论述和他所持的观点。

所有这一切是我跟学生所讨论的实质内容。不过，在这些讨论之余，来自上海的学生把我带到天安门广场中心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这是所有的学生运动领导人及西方媒体记者所在的地方。在那个特殊的日子，我遇到许多学生领袖。我不得不说的是，相较与其他基层的学生，他们对政治理论缺乏兴趣。这并不因为他们的生存条件与普通学生有什么不同，更多的因为他们正在领导一场“战斗”。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我是否可能资助些金钱，赞助帐篷；或者如果一旦有人入狱，可以通过我与西方劳工运动组织的关系网络实施国际声援；他们更多的是关注诸如此类颇为“实际”的问题。

我必须补充一点，在学生中存在一些半自觉的政治意识，如学生领袖可以被更换，生活条件也不比其他普通学生好多少，在行动中表现的往往比大多数学生更积极。这些领袖们确实非常勇敢。首先，很多学生领袖都进行了绝食。我遇到的一些学生领袖是最早组织绝食行动的。有的因为绝食遭受脑损伤。其中有人因此留下后遗症，说话像个孩子，这很可怕的。我与这些因为绝食大脑受到损伤几乎成为植物人的学生英雄进行讨论的时候，他们基本还可以交谈，但控制力很差，显得非常不安、紧张，经常会跑题。他们的健康将难以彻底康复。

我不会说任何一句任何学生领袖的坏话。因为其中很多人现在已经死了。他们是真正的烈士、真正的英雄。很多人都知道，只要他们决定带头领导运动就相当于签署了自己的死刑判决书，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身上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是精英，是除了马克思主义者之外不会在外面世界存在的精英。非常庆幸能够遇到这些同志们，这全是因为他们的英雄壮举的感召所致。

顺便说一下，当时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学生组织领导学生。即使在纪念碑前，也有五、六个不同的学生团体。在这次学生运动的早期，一些领导人都是非常活跃的共青团干部和成员。起初，他们将运动看作是支持赵紫阳与“强硬派”的斗争。但这种设想却没有长期持续下去。在我到达广场之前，这里已经被更激进的团体所取代，他们想留继续留在广场替代了想要离开广场的政治团体。他们同意，理论上就需要一个整体的学生组织统一协调。但是在没有理论和纲领的情况下，要汇聚起来难上加难。事实上随着运动开始退潮，在不同的群体中真的发生了一些冲突，但不是政治上而是在分配帐篷和钱物等方面。

对理论的渴望

在之后的几天里，我还与学生领袖们进行了进一步的交谈，许多谈论就在帐篷中展开。

“6·4” 1989 ——震惊世界的七周

一次又一次的讨论，我正在经历我在西方世界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政治工作。我只要走进一个帐篷便可以开始讨论；而一旦我表明自己的身份，马上就有人聚在我的周围；给我提供清凉的饮料、香烟，有的还热情地拍拍我的后背，有的还把我当成歌星似的索要签名！但这绝对不是“认识一个西方人挺好”的奉承，而是因为“你是我遇到的第一个西方的社会主义者，非常有幸能够认识你”。当然，真正感到荣幸的是我，不是他们！我不想说的太过夸张，假如简短的用一句话来说，只要是学生们关注的问题，他们非常渴望能得出相关的政治理论。在接下来的一遍又一遍的讨论中，最终我们对今后的思路和努力方向达成完全一致。

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可以看得出这些学生具有很好的文化修养。在他们中间，没有粗话、没有毒品、没有酗酒、没有性别歧视。在广场上，男女学生并排躺着休息，也没有冲突和骚扰。人的性别差异在此得到充分的尊重。

在星期二的晚上，有些学生为我组织了一次在学生领袖们的会议上的讲话。在那次会议上，我很荣幸能获得一枚天安门广场的纪念徽章。这种徽章的数量非常有限，是专门为那些做出英雄壮举的学生们定制的。对他们来说就像相当于大英帝国的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一样。对此，我感到非常的荣幸能够获得这么一枚勋章。不少我曾经会晤的学生还没有得到一个，我觉得他们都有点嫉妒了！这枚徽章将是我生命中永远的一部分，除非有人愿意给澳大利亚战斗派的政治基金提供 1000 澳元，那么也许我会考虑转让；否则我将永远地保存好它。

独立工会

星期一晚上发生的事情影响是巨大的。有学生对我说：“你为什么不来跟我们一起来，我们会给你介绍一些要组建独立工会的工人”。于是，他们带着我穿过天安门广场到达紫禁城。我不知道你是否曾经看过电影《末代皇帝》，电影描绘了紫禁城作为中国皇帝们进行政治统治的象征。我现在被带到这里，这是一个庞大的上了锁的大门，约有 10 米高，门前聚集着一些工人而非学生，他们望着大门试图进去。在门的另一边，有 6 名工人手持棒球棍，就像一只小小的守卫大门的工人武装。他们后面有三十多个工人领袖力图筹组中国的独立工会 他们认为这将是波兰团结工会式的独立工会。

我的向导兼翻译和我用从学生那里获得的一个通行证穿过众多想进入的工人一直走到大门前，那些工人民兵非常严厉地盯着我们。大概他们把我当成想从这里获得爆料的记者了！但当明白我们的真实想法，他们打开了大门，后面想跟着我们一起进入的工人们却被他们挡在了外面。中国工人组建独立工会运动的热情如此强烈，他们积极关注着会发生什么事情。

顺便提一下，人们进行讨论的政治热情可以让我们知道到底情况如何。仅仅走在街上，你会发现一堆人聚集在一根电线杆周围。起初我觉得非常奇怪，这些人看着电线杆干嘛？可是当你走到跟前的时候，你会看到贴在电线杆或者灯柱上的地下报纸，每个人人都在阅读这些地下报纸，特别是在前面所述的游行途中的时候。这简直就和你读到的 1917 年俄国革命时候的情形一模一样。整个情形令人震惊。任何拿着传单出来的人都会被人关注。这就像你在悉尼的大街上举着一张 10 元的纸币一样。我的意思是每个人都可能从你手中把报纸抢走。人们几乎阅读任何他们可能接触到的资料。我碰巧有一张香港的资产阶级报纸，虽然它已破旧不堪。但人们仍然向我索要上面的照片，这显示出人们对信息和思想的渴求。

我们到达紫禁城。……当这些工人领袖一了解我是谁，来这里是干什么的，他们立即就变得非常地狂热。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象，甚至比学生的反应还要积极。他们一直在说：

“6·4” 1989 ——震惊世界的七周

“这简直是太棒了”。他们立即拽过来六个椅子，让我和翻译还有4名工人领袖坐下。这不是官僚制度的原因；而是因为与学生相比来说，纪律更显严明，他们坚持只有6个人能够参加那次会议……之后我才可以对其他三十渴望听到的工人朋友们交谈。其他的工人对此表示出十分不满，有两个人因为不允许面对面地参加我们的讨论，当时甚至伤心地要掉下眼泪。

这些工人领袖跟学生们比起来有一个差别，就是他们每个人都做笔记。他们每个人都拿着笔记本，记录下我所说的每一句话。（因为与学生相比来言，他们会讲英语的人更少一些；所以我说的比较慢，然后再由翻译翻译出来）。我们不间断地讨论了3个小时，主要集中在波兰团结工会问题的教训上。因为这些工人们听得非常认真，他们很快就抓住了我说的意思。“基本上，你所说的主要意思是我们要推翻中国共产党”，他们说到。他们领会的速度远远超过学生们。这不是说要贬低学生，但从工人阶级在社会的作用和性质等方面可以得出的这样的结论。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拥有家庭，但他们已经完全把他们的家庭置之度外。

一名工人告诉我，他把他的80%的工资用在独立工会的运作上。他说：“这就是我的生命”。我说：“这意味着你对未来的投资”。他说，“你描述的很准确”！这让我想起一些来自南非的报告，那里的工人们将独立工会视作是他们摆脱种族歧视和资本主义的唯一途径。

与学生一起很容易就一些基本观点达成一致，甚至是对于整体的纲领达成一致。而与工人在一起就不同了，一旦谈到推翻共产党组建一个工人和学生的政府的时候，他们不会轻易听信对方，除非他们完全相信我是在认真谈论这个问题。因为对于我来说这是很容易的，我来自海外而且只是口头说说而已，但对于他们这些必须去实践它的人而言是截然不同的。所以讨论的问题一次又一次回到原地，回到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下他们的要求能否实现的问题上。他们需要被说服，直到确信这根本是不可能的。这并不是很容易解释清楚的，尤其是在面对波兰的团结工会这样一个明显的教训。但我们进行了三个小时非常激烈和有意义的讨论。在讨论行将结束的时候，他们说：“明天我们就要组建我们的工会。你能否来参加成立大会并发表讲话？之后我们可以回到紫禁城继续我们的讨论。”我认为这是个很好的主意，为了表达我们的团结与支持他们的发展，我会回来与三十个工人领袖进一步探讨今后的发展。之后我离开与学生们展开了更多的讨论。

第二天当我回来的时候，前一天晚上我们曾经进行谈话的四位工人领袖中的三人已经被捕了，连同他们的笔记本也被没收了。说实话这让我真的有些担心！为什么他们会被逮捕？事实上，在那些日子里，官僚体制内部一直在讨论下一步采取什么行动。“我们应镇压这场运动？派驻军队？还是让它自生自灭？”就个人的观点来看，我认为这是因为中共上层觉察到了要成立独立工会的苗头，他们也从波兰的团结工会事件中得到教训，预知到这样做下去局势会急速发展难以控制。这就一个是转折点！当他们决定开始行动的时候，他们会说，看，我们必须干预这事，我们必须保持稳定。所以说，逮捕那些三名工人领袖绝对不是巧合，因为在这一阶段还没有学生们被捕，至少就北京而言是这样。但这些工人被捕确实太快了，这是因为中共上层觉察到这可能带来的结果所以立即采取了行动。

周二当我到达紫禁城的时候，他们告诉了逮捕的消息。显然，我能够做的只有联系国际社会举办声援行动以争取早日释放这三个工人领袖。顺便一提，他们三个人于第二天就被释放了，尽管他们中大多数在以后（大屠杀）中被杀害了。我将在后面提及相关的具体情况，事情发展超越了我们所能设想的。

当我在傍晚再次到达紫禁城的时候，每个人都在打点行李准备离开。我问：“会议的事情怎么样了？”他们回答说：“会议不会在这里开了，我们会到路的另一边去开会。”我

“6·4” 1989 ——震惊世界的七周

说：“好的”。我们坐在那里呆了几个小时，直到天色开始慢慢变暗，大约晚上7-8点钟，我们穿过紫禁城重新回到天安门广场。这已经是下班的时间了。在过去的24小时里，今晚将要成立的独立工会的海报已经贴遍了北京城。因此，当晚九点大约有50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我要说明一点，这里面大约有40到50%是工人。

五十万人

我们向前走，一直走到人民英雄纪念碑下面。从那里可以看到广场上的一切。

你能够看到你面前的50万人，他们充满着对思想的渴望，对组织的渴望，对于引导他们前进的道路的渴望。这是如此一个壮观的场景：50万人摆脱了日常生活的枷锁，抛弃了所谓养家糊口的羁绊，静坐在那用政治手段争取他们首要也是最为重要的利益，真是难能可贵。天慢慢黑了下来，有人用闪光灯拍照，也有人点燃了香烟，望眼一看到处是闪闪的亮光。这时你感觉到自己如此渺小，此时伫立在你面前的；就是工人阶级的力量，或者说是潜在的工人阶级力量。由此可以推知，如果这次运动能够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结合起来，地球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它。

在会议开始前，社会各界人士团结地走到一起进行声援：一名僧人、一名本地的流行歌手……最值得关注的是，还有一位98岁的老太太，非常的柔弱；她曾经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并且见过毛泽东本人。在人群中显得非常突出，尤其是这场运动将会受到镇压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虽然没有人预料到镇压会如此血腥）。翻译把她的演讲简要地告诉给我。她说，她曾经把她的生命献给了1949年的中国革命。今天她站在这里无法高兴起来，因为解放40年后人民还不得不为生存而斗争。但她不得不这样做。她说是同学们的精神激励了她，她感到她自己与学生们在一起，虽然她很快就会死去，但斗争必须继续下去。说实话，我被老太太的行为和言语感动的热泪盈眶。大家给予老太太热烈的掌声。

晚上10时左右，会议正式开始。我简单介绍一下背景。北京各地，尤其是在市中心的区域，政府在所有电线杆上装有高音喇叭。特别是自运动开始时，全天不间断地进行播放，他们不停地播放新闻社论，这如同电影《1984》描述的情况一样。他们用声嘶力竭的语气宣称目前的情况是“社会余孽”、“极度混乱”、“反革命”等等，但与此同时你可以看到在你面前的是世界青年和中国的工人阶级中的精英分子，他们在为争取真正的社会主义而进行斗争。在广场上学生也有自己的广播网，他们用大喇叭大声地播放《国际歌》。仿佛在说：“这些都是谎言，我们不是反革命，我们真正继承了国际工人阶级运动的传统。”

工会的成立

在大约10点，工人领袖站起来面对嘈杂的人群大声宣读了工会的诉求、成立的原因和章程等等。我是第二个发言人。我站起来表示声援工人，代表那些在过去数几周为北京和中国各地发生的运动所感动的世界各地的工人和学生们。然后，我粗略地强调了一下学生们下意识中已经提出的纲领：争取选举的权利、罢免所有的官员，所有官员必须与工人同薪等等。继而又转到中国共产党政府的问题上来，我说任何“共产主义者”或者任何自我标榜的“共产主义政府”只要其逮捕工人，无视工人的民主权利，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我说，中国真正的共产党人，就是那些坚持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主义传统并支持这场运动的的共产党人。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声明反响非常好，这就是人们迫切想要听到的。我讲了约10-

“6·4” 1989 ——震惊世界的七周

15 分钟。气氛很好，之后又有两个人上台发言。

人们并不希望听到：“你们应该走西方式的道路”或者“我们西方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民主权利，这条路是你们必须要走的”。一名学生向我提问：“你看，如果我们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就会像印度一样，而不会像日本。我们有 10 亿人口。如果资本家重新来到中国，他们会在经济上进行残酷的剥削。我们不会对此抱有任何幻想。”

西方的媒体记者制作了不少关于学生们把“自由女神像”竖立在广场上的宣传。但同学们说这并不是支持美帝国主义或者想要回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来的象征。它标志着支持民主权利。而且不少学生对于在此设立这个塑像也有过怀疑。他们对我说，“如果我们这一切发生在南美，我们认为不会运作得这么好。”当自由女神像被竖立在天安门广场的同时，国际歌也在全天播放着。我想关于学生们是否想重新回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来，大家应该是有疑问的。

而这正是因为计划经济体制所带来的成果。譬如中国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举一个小小的例子，你可以花上整整一天时间在北京动物园逛上一圈，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好的动物园，但门票钱只要 1 澳分左右。地铁、公共汽车和房租等等都很便宜，几乎就像免费的一样。虽然仍然征收费用，但只占工资收入的一小部分。但由于通货膨胀导致食品和衣服价格的飞涨对于普通工人阶级而言是一个大问题。

一位学生对我说：“我们了解西方，我们并不愚蠢。我们知道只有少数西方国家，如日本、澳大利亚、英国等生活比较富裕。即使在美国黑人也受尽了折磨，而且美国也存在很多失业。我们知道，在所谓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中，大多数人生活在非洲、南美和中美洲等国家。”人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要维持 1949 年革命所带来的巨大成果，换言之也就是国有化和计划经济体制及其带来的文化、社会和经济效益。但他们认为这些好处局限性很强，中国人所具有的无限潜力和优秀才能被中国的官僚统治所湮没。

资产阶级记者看到中国的工人太“懒惰”，因为中国存在很多人浮于事的情况。但我想说的是，即使麦当劳中比较努力的员工来到中国来工作也未必会不懒惰。但这不是什么“冗员过多”或者说中国人是“天生的懒惰”。事实上，每个人都有一份工作，正是计划经济所带来好处，虽然中国政府中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派”试图终结保证就业的状况。如果当你知道无论你怎么做，你也不会得到更多的好处，你还会继续努力吗？政府理应是人民的政府，而当你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发言权。这一点与为资本主义的企业没有一点不同。在这里即使你工作很努力，并且在下午两点完成了你的工作，假设只有下午五点钟才能下班，你不可能被允许提前三个小时离开的。你必须又要额外付出三个小时的劳动。不幸的是在这些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是这么工作的。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生产积极性与解放初期根本无法比拟。正是因为政府的官僚所致，而不是人民的原因。并且他们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

早先的政府媒体，也表明由于官僚主义自身的管理素质实在低下，管理不善和腐败问题严重而影响来自海外的投资。当它们试图获得廉价的原材料，公司会来投资，但将货物从一省份转移到另一个省份的时候却和封建时代没什么两样。国家的统一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历史性任务。但基于斯大林主义，中国革命还未做到这一点。货物从广东运送到北京，你要经过几个省份，经历不同的税收系统。你必须填写一式三份的表格。如果您想在北京购买一盒火柴，你也会得到一式三份的收据。这简直是疯狂的官僚主义行为。即使在殖民地国家也不会这样。

“6·4” 1989 ——震惊世界的七周

“仅在一个国家实现社会主义”这是对经济的扼杀。你可以通过报纸上一位上海学者的文章得出这一结论。他是这样写的，看看西伯利亚，它需要开发，但是苏联工人都不愿意去西伯利亚；他们必须得到三到四倍的工资才会去。而我们我国东北地区以及北京都存在过剩的劳动力。他们愿意去西伯利亚的，因为即使只得到一半苏联工人的工资，他们的收入也会超过现在在中国的收入。当然，我们本来就是两个国家；戈尔巴乔夫来访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其实，这就是他的提议。但在现有的官僚体系统治下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恐龙型政府

来自新闻报道的其它稿件不断地抱怨中国污染的程度，情况非常令人绝望，尤其是北京，因为它是一个内陆城市。

他们把责任归咎于官僚作风，这确实很重要。所有这些事情都令人非常失望，知识分子和学生反应更加明显，反映了更深刻、更广泛的和自发的一种情绪。一切都正在发生变化和改革开放也正在进行，全国范围内的迁徙已被许可，人们可以去海外学习，但他们仍像文化大革命一样被相同风格的政治官僚所控制，陈旧的政治体制伴随着非常先进的科学技术，这种结合以及不平衡的发展随处可见。在北京，尤其是上海，你会感觉像是在伦敦。夜总会和餐厅不亚于任何西方大城市。但顶层的恐龙式政府总是生活在过去，例如他们会说：“有上百万人牺牲”或“新一代已经忘记了长征的精神。他们从没有解放中国，江山是我们这一代打下来的”。

在政治和经济之间有一个总的矛盾，并且对知识分子有很大的影响。当人们看到苏联、波兰和匈牙利等国在政治上开放，他们会说，好的，我们也要这样！这不是一场自下而上的抵制经济退化的运动，这是一次知识分子开始的运动。这也是为什么要花一些时间让工人们意识到投身到这场斗争中去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事情。

当然它得到社会各阶层的大力支持，这不仅仅包括广大工人，而且包括了更广泛的阶层甚至包括庞大的官僚阶层本身。有个例子，我到的那一天，游行队伍中有一支队伍就是来自于官方的《人民日报》，这是世界上拥有最广泛读者的报纸。这份报纸报道每天都发生的事情。为了逃避检查，记者以这种方式开头：在天安门广场，今天发生了一些非常糟糕的事情。然后他们详细描绘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最后他们加上一句：“李鹏总理说，这是令人不能容忍的！”他们从游行的人群中得到了一些很好的反应。形势的发展被甚至以不插评论的方式在政府电视台播出。通过这种方式，其他城市甚至农村的人，都能看出事态发展趋势。但最有效新闻传播的途径还是“丛林电报”（口头传播），我们在澳洲这样称呼它。城市居民在国内旅行很少受到限制。列车上坐满了要去或者从上海等地而来的学生。

但除了所有这一切，工人阶级还没有走到运动的最前沿，甚至没有以罢工的形式为这次运动留下他们独有的印记。我到达之前，这次斗争发展到最高点时，工人们走出自己的工厂，上街进行游行示威。但即使这样也没有进行一个有组织的罢工。在大屠杀发生后第二天，有人号召发动总罢工，所有的交通被阻断了。饭店工人们出来了，但建筑工人仍然在工作。至于工人所关注是，他们担心如果参与这项运动又没有胜利的保证，一旦失败了他们将失去现有的工作。这是我和工会领袖讨论时他们提出的一个问题。

工人们的情绪

工人们也有这种担忧，运动迟早要走向结束但目标仍然十分模糊。“我们同意学生对民主权利的要求，但他们其实并没有谈论到权力。此外，我们并不确信，如果我们站出来，那么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是否会仍然由以前一样的坏头头来领导我们，对于整个社会而言也是如此，未能真正地摆脱共产党的官僚体制。”这是工人们在思索的事情。除非坚信情况会有所变化，否则工人对是否加入独立工会也犹犹豫豫。

而事实上，在过去10年的经济改革中，有着相互矛盾的影响。部分职工从中受益。例如，至少在北京或上海这样的城市，没有消费品短缺，从小轿车一直到外国香烟，这一点与波兰截然不同。此外，有种体系曾经让官僚和外国人有特殊的不同于一般老百姓使用的外汇券，但这体系一而再、再而三地正在被打破。如果你乘坐出租车坐，你要付外汇券，他们可以用这些外汇券去购买消费品。

同时，给运动积极的支持多是收入较好的职工。比如说，独立工会的创始人就大多来自相关高收入的行业。大概这使他们感到更自信，但同时他们的收入也被通货膨胀所抵消。让这些工人们再回到过去那种严格的中央集权和文革式的压制是不可能的。如学生们说的，我们已经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接下来要进行的民主政治体制改革会是怎样？当然还是计划经济基础上的民主。

假如独立工会在一个月甚至在两个星期之前成立，它发展势头会非常快。学生们已经给了工人们信心。但它目前建立的时机是是学生运动开始衰退的时候。广大的工人感觉大势已去，没有足够的信心积极参与进来。但下次如果运动爆发，毫无疑问，一个独立工会将会在运动开始时就崛起。

上海

历史性的会议后的一天，（此次会议非常具有历史意义，因为它是中国自1949年革命以来成立的第一个独立工会），我到达上海之后，在那里我和高校大学生进行了一些非常精彩的讨论。

我需要就学生们的生活方式说明几点。你可能会有一种印象，中国的学生从某种意义上是特权精英组成的，他们投身运动并不是因为对自己生活境况不满而是因为对现实社会的不满。这是一个错觉。上海大学的大部分学生所居住的大学校园和宿舍的条件是非常糟糕的，10人一个寝室，没有地毯、也没有瓷砖，只有水泥地面和水泥墙。有的地方甚至连油漆也没有。暖气那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得到的食物味道很不好，我的意思是你仅仅是可以吞下去，但味道确实很难吃。政府给他们的助学金非常少。学习的过程中，他们经历了很多经济的困难。所谓的特权就是能够在大学有这么一个学习的机会。

傍晚学生们为我举办了一次会议，其中还有个绝食者第二天要去北京。这是一个足有500人参加的会议，四周环绕手持棍棒的学生，因为学校的管理层已取缔了这次会议。我概述了中国的斗争和其它斯大林主义国家斗争的联系，如波兰，南斯拉夫和苏联等国。学生们的国际主义被激发了出来。我把他们的经验体会加以国际化的描述，其真实的反应也会显现出来。他们对伦敦或纽约中国大使馆门前的烛光守夜兴趣不大，他们需要的是思想，需要有人能指明运动发展方向。只要海外的朋友们能够关注他们就感觉很大的满足。至少那是我从他们那得到的印象。

“6·4” 1989 ——震惊世界的七周

尽管我当时还不知道，在我讲述我的观点的时候，仅仅是在一个500人的秘密会议上，但演讲其实正通过学生电台向5万大学生直播！第二天，我很快就回北京。周六，大屠杀的前一天，我又回到天安门广场……。像以前一样，那天我和不同群体的学生们就以前类似的内容进行讨论。

周六，6月3日

晚上的时候，我回到纪念碑前，就是想坐一会。这是一个温暖而美妙的夜晚。周围有成千上万的人。这是一个周末的晚上，大家都有一点休息时间。明天将是新的一天……工人们总是周末出来。一切似乎都是那么美好。傍晚时分，空气变得有一些紧张。学生立即派人联络那些“待业青年”，学生们通常称这些人是“监狱外面的鸟”，他们支持学生，只是有些粗鲁而冲动而已。他们是一群很棒的小伙子！事实上，他们手里只有叉子和棍棒，就在我身边坐着，但不会说英语。其中一个青年给了我一瓶水，我喝了一口……怎么跟爱尔兰私酿威士忌似的，这根本就不是水，这是迄今为止我喝过的最烈性的饮料！本来以为是水呢，我竟咕咚喝下去了。还好我没有咳嗽，也许他们会想，“甭说，这哥们可以啊”！

与此同时，发生了几件事，让我和一些学生感觉到今天晚上要有什么事情发生。首先是政府曾派特工进入了广场。如果中国政府现在在镇压上还不够成熟，如果你看过《大游戏》或《逃亡夜》，或访问过东德，你就会知道，镇压是赤裸裸的、血腥的。举例来说，这些特工都穿着绿色卡其布裤子和白色衬衫！他们明显按指示分开进入广场，但广场上的情景使他们感到恐惧而聚集在一起！事情的经过是，学生们将他们抓起来，并拖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揍他们。学生们不会杀死他们，只是对他们拳打脚踢。然后，学生们就会把一个麦克风放在他们面前，你会听到“嗯，嗯，嗯，嗯……哇……很抱歉，我并不想这样，我是被迫来的”。学生们再给他们一顿狠揍，然后让他们滚蛋。这倒是一个不错的策略。

广场上的学生和工人们都没有武装。在过去几天和几周内，军工厂罢工的工人们曾提供枪支给学生，但是学生们拒绝了。就在周六，因为27军正在从西郊向北京市区进军，两辆装满了武器的装甲运兵车停下来要为学生提供武器，学生们再次拒绝了。学生只有棍棒，少数学生也有手枪，他们将自己看作恐怖分子要枪击李鹏。他们不愿意与其他人分享他们的枪：这似乎是一个特权，有枪似乎是一件让人感到自豪的事情。而实际上他们也只有6、7发子弹。

大约下午五时，天还没有黑，约有三千名军人开进了天安门广场西边的人民大会堂。他们占领了这座建筑物。他们里三圈外三圈的团团坐着。大部分人是手无寸铁的，但有些在中间的士兵是有武装的。学生们围着他们并与他们讨论，事实上交流进行的非常好。有些士兵哭了，并说道：“我们并不想来这里”。

必须指出的一点是，中国军队的构成完全是一支农民的军队。在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这都是一支农民的军队。例如，在一个上千人的工厂，只有3个人会被征召入伍。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工人却被征集当兵那是活该你倒霉；如果你考上了大学，你就十有八九不会被征集入伍了；但大多数农民要当兵，因为服完3年兵役后，他们就会被允许留在城市，对于普通的农民来说这可不是件小事。所以，即使是当时的“北京卫戍区”，也是指从首都周边来的农民，没有多少是来自北京工人和学生。

这是一种有意识的官僚政策，把军队的基础建立在农民中而不是工人中。但即使如此，

“6·4” 1989 ——震惊世界的七周

几次没有武装的士兵们进入天安门广场并试图清场时，这些来自农民的军人回应包围着他们和车辆的工人和学生的诉求，也只是劝说他们赶紧离开。

凶残

周六晚上，一位学生从西城跑回来，说带着催泪弹的士兵们已经开进来了。再加上前一天一辆军车撞死了三名学生，空气一下子紧张起来。一名学生开始向士兵们投掷石块。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了野蛮的景象，而几个小时以后我又一次看到。

一群士兵冲进了失控的人群，并抓获了这个学生，他被押到 3000 人部队的中间。他们剥光了他的衣服。天气仍然非常炎热，32 摄氏度。他们用木制拍子打破了他的头。他仍然站在那儿。他们确定他还能站的住，结果就把他的头骨打裂了。他只是站在那里直到流血过多而死亡。约两小时后，他倒下死了。这是很恐怖的一幕。他被迫站在那儿，全身赤裸，鲜血从他头上的伤口流着直到他死亡。

但在这一阶段，工人和学生们仍有信心。我必须说一件事，工人的独立工会计划接手策划。他们拿着这座城市的地图讨论着：“部队在这里，部队在那里……我们应派遣大批工人去这里，去那里……年纪大的女工（在与部队的辩论并阻止他们开枪时表现最好）应该派到那里，因为这些都是最残暴的部队，跟他们将会有更多的辩论。”随着深夜的来临，他们接手了这些学生的工作。他们的想法似乎是：“现在这是我们的战斗。学生已经发起了这场运动了，这是很了不起的，但现在该由我们来领导了。”但同时，独立工会还处在萌芽阶段。因为成立时间只有数天之久。由于它是在运动开始消退而不是一开始的时候成立的，不少工人仍害怕加入其中，也不敢进行斗争。但工会领导人尽力去做他们能做的，他们认为自己没有背叛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携带武器。

事情发生在午夜时分。27 军从西边开了过来，这不是北京的部队。他们曾在越南战斗过，他们也曾镇压过西藏的民族运动，并曾驻扎在苏联边界，这是一支习惯于杀戮的部队。你可以看到在几个星期之前官僚们与指挥官们把这批部队禁锢在城市外的帐篷里，不让他们读报纸。只是对他们进行灌输：“当你们进城后，你们面对的就是法西斯和反革命。他们会对你说，你们是解放军，不能向人民开枪，等等。但这只是一个骗局，这不是真相，这只是宣传。”这样部队已经知道学生和工人会准备对他们说什么了。战士们就这样被洗脑了。

还有传言说，他们被注射了毒品。当然他们被告知，天安门广场瘟疫弥漫，需要注射防疫针，但这不是事实。戒严之前，官方报纸承认，在北京发生的交通事故和犯罪问题——当时北京基本上是由于工人控制和管理，或者至少部分如此——有明显下降。戒严之前我在北京除了交警外几乎看不到一名警察，交警似乎也是多余的，他们只是站在那里，而学生在那里指挥交通。也有传闻说，这些士兵是被注射了肾上腺素。一位曾在阿尔及利亚战斗过的法国记者告诉我，当他们 24 小时急行军的时候，他们都被注射了肾上腺素，这样可以让他们保持清醒和警惕，看来现在的这些部队估计也是注射了这玩意。

现在开始，如果我的陈述不是那么流利，那是因为在上周我看到一些可怕的东西，那种恐怖的事情我绝不希望再看到一次。唯一的保证就是要使群众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午夜

午夜时分，军队开进了广场，按照以下方式推进。先是有一些人投掷催泪瓦斯，接着有了同形式的催泪瓦斯。这些催泪瓦斯不只是使你的眼睛流泪，而是主要让你的腹部和胸部难受。当晚，一些学生给了我一副催泪瓦斯面罩，我感到很荣幸，我似乎在领取一枚徽章，因为实际上没有多少面罩。我不想接受，但他们一直坚持，这让我没法说不。

在发射过催泪瓦斯之后士兵开始使用警棍。这是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这些官僚们一面说学生们是亲资本主义的，而政府是一个“革命政府”，另一方面这些警棍却来自台湾。反革命的资本主义台湾供应警棍给中国斯大林主义政府殴打中国学生和工人。不只是用警棍，还有电棍。这样，当你被击中的时候，不仅是你的脑袋或身体其他部位受到重创，同时还会有电击的感觉。

这是第二，第三步是持枪的士兵。接下来就是坦克和装甲运兵车。与装甲车一起的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带有大型天线的美式吉普车，指挥官们就在里面。此外，还有直升机，但我认为他们在晚上没有什么用，因为他们没有探照灯。他们只是恫吓人民。但第二天，如同政府所希望的他们开始变得非常有用。

用大客车组成的路障在下午六时沿着进入广场的道路搭起来了。广场上的人们一看到军队过来就把公交车点燃。现在在北京市中心的每个街道都有一道一英尺半高的屏障。人们挖好这些屏障，将燃烧的巴士堆在路障两边。他们把道路挖开以获取石头。很多高层建筑被学生们占据。所有的砖块已经被砸成两半，这样可以扔的比较远。扔不动的大砖块是没用的。只有极少数的工人和学生有枪。

但是战争的前线是政治性的，前线首先是进行宣传战。即使携带催泪瓦斯的部队来了，人们仍然跑向他们大喊“你不能向我们开枪，你们是人民的军队，你们怎么可以射击人民？”即使当天晚上，也发生了这样的故事：一些部队拒绝射击，长官们却威胁他们，逼迫他们开枪。因此，当它真的发生，当他们真的开始射击，连我自己，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都认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这听起来很幼稚，但在当时，当你亲眼目睹一场大屠杀，那绝对是一个令人震惊的经历。你周围的运动裹挟着你，我周围的运动让我相信他们不会开枪。当它发生的时候，这真是一个巨大的震撼。

屠杀

他们只是在不停地开火，而人们一个个地倒下。永无休止似地身躯一具具的倒下。但人们再一次站起来，继续向前推进，有时挥舞着红旗，有时以砖块还击，而有时仅仅只是呐喊。人们会再一次地倒下，也会再一次地站起。而军队在向每一个人射击。

我看见一个3岁的孩子，刺刀刺穿了他的胸部。我看见一名孕妇，被刺刀刺穿腹部而死，刚刚成形的男婴就躺在她的尸体旁。他们做的这些极其野蛮。

我要说一件事。有一支半小时巡逻一次的车队开过来了，冲过了学生和工人的路障。但他们是在下午时分在工人阶级中列队。所以只要他们一开始运动——所有的人都聚在一起，因为没有一个人想被孤立队伍的后面——成千上万的工人就会跟在后面，他们手无寸铁，还有一些女职工，其中有些人骑自行车。跟在队伍后面的数千名工人没法和他们作战，他们只是唱国际歌。部队后列的人不知道怎么办，他们偶尔会开枪，大家会趴下，但你不知道有

“6·4” 1989 ——震惊世界的七周

多少人被杀，因为他们每次又爬起来，而死去的人却躺在人群中的地上。就像沙滩上的海浪一次次地涌上来，他们只是唱着国际歌。

夜越来越深，人们越来越愤怒，他们开始冲着士兵高喊：“法西斯，法西斯”。任何说这场运动是反革命的人，其实只要在那里呆5分钟就足以明白真相。

连资本主义记者也不敢相信他们所看到的。但我必须说，虽然有些记者被吓得逃走了，有些人却很勇敢。比起改良主义的西方劳工运动的领导者，这些记者们更有良心。因为他们被报社从一个冲突中心派去另一个冲突中心，他们对发生的一切有一个国际的分析，他们看到了世界性的革命就发生在他们面前。但即使是这些人，其中一部分，还是不敢相信他们所看到的一切。

部队到达天安门广场，这场革命的中心，他们坐下来把天安门广场包围了起来。学生和工人被从北方、东方和西方三个方向包围起来，只有南面可以逃生。部队给了学生一小时的时间让他们脱身。正是在这个时候，我离开了天安门广场，有三名同学帮我从南方逃出来。然后一大堆的学生领袖聚在一起，学生们组成一个方阵，就像滑铁卢战役中的步兵纵队那样穿过部队。当然，在他们穿过军队的时候遭到了一顿痛打，但没有一人被杀死。

还有一些工人和学生坚持留在广场。军队将他们杀死。他们开枪将他们打死。他们只是向他们开枪。死者和伤者躺在广场上。然后坦克进来了，并辗过他们，把他们碾平，碾成肉酱。然后士兵们用推土机把尸体和帐篷收起来，所有的东西堆成一堆纵火焚烧。我确信一些人被焚烧的时候还活着，虽然我没有拿到证据。而这些人将被官方煞有介事地宣布为失踪，而不是死亡。

这是星期日的早晨，直到中午北京的街道还有枪声响起。大约6点左右，我回到了天安门广场。我看到事情的另一面，因为这不是一场一边倒的战斗。

巷战

有一次，部队对学生使用催泪弹。学生们逃开了，许多人试图爬过栅栏。有11位学生没有爬过去，坦克开过来，沿着栅栏碾过去把他们碾死了。当他们的尸体再一次露出来的时候，已经像火柴盒一样平坦，他们死了。但那辆坦克与坦克群脱离了。工人们包围了它，那情形就像一只死老鼠上爬满了蚂蚁。他们扳掉坦克的盖子，里面有一名指挥官，而不是一个普通的坦克驾驶员。他们把他拖出来，殴打他，然后把他活活烧死，这些就像我们在1984-86年的南非起义中看到的一样。然后他们将他挂起来向远处的部队示威，警告他们。事实上，一旦大屠杀开始后，人们试图控制住士兵将他们分离开。但在这个阶段，他们别无选择，这时已没有任何其他办法。

我必须说，如果工人能够武装起来，如果再多几个这样的例子在这次斗争中早一点发生，事情可能会有所不同。我的意思是，不是哪一个士兵单独被抓，不是哪一个特工单独碰巧被派去天安门广场被群众所吓呆。那样的事情上没多大用处。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打他们一顿，让他们表示歉意，并就事论事的做一些宣传，根本无济于事。但是，当军队开始进行杀戮并开始象这种肆无忌惮惨无人道的杀戮的时候，这时只有进行强硬的回应。发生在眼前的一切到这时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有些事情是不得不做的。

在这个星期日人群中弥漫的情绪不是沮丧而是愤怒。但这是毫无意义的愤怒：“这怎么

“6·4” 1989 ——震惊世界的七周

会发生？”我的感觉一样。我原本周一在广场上有会议，我花了整整6个小时才确信天安门广场在一夜之间就清理干净了，可这里头一天晚上还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怎么今天就从革命走向了反革命，而眼前的天安门广场成了27军血腥的屠宰场。我认为自己是一个相对资深的马克思主义者，亲眼目睹了很多事情，看得很彻底！但我觉得自己现在像一个傻瓜，因为我花了六个小时去接受所发生的这些。我对人们说：“我可以肯定学生依然还在。我必须参加周一的会议”。人们嘲笑我说：“别傻了。他们已经死了。一切都过去了，都结束了。”

你能否想象中国工人和学生曾经把他们的生命和一切都投入到天安门广场上的运动中。天安门广场本身就意味着他们的一切。接着这一切又被无情地粉碎。而这一切都说明了思想的重要性。他们迫切需要一个对未来明确的分析和纲领，他们迫切需要的是明确的领导，遗憾的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当我跟着学生走在天安门广场外大街上，我遭受了一点催泪性瓦斯的影响。现在，由于周围的气氛在急剧地白热化，我感到一丝莫名恐惧的无助。如果与我说的有些许不同那我就是在撒谎。任何参加过战争然后回来说那是很伟大的人不是傻瓜就是在说谎。我们其实都很恐惧。但这个星期日上午的确是不平凡的上午。我们被射击，我们被催泪瓦斯袭击。但是因为我们周围到处是尸体，因为我们感觉无比的愤怒，我们所有的人，当然也包括我，都将尽我们所能去做些事情。

前几天与我一起进行讨论的人中至少有10人已经死了。其中一个女孩，前一天晚上我们还一直在讨论“待业青年”的问题，她是18岁的少女，带着一副约翰·列农式的圆眼镜，穿着一身黑白相间的衣服——一个非常瘦小的姑娘。我们曾经在一起开玩笑、聊天。但是第二天，我看到的却是她的尸体。

因为我是那时唯一的一个西方人，我有照相机，学生们领着把我从一个尸体走到另一个尸体。“拍下来。你怎么看？回家以后你可以告诉人们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事实上，一些学生给了我他们杀死的军队指挥官的衔章和他的纽扣。这现在看起来有些奇怪，但在当时却觉得没什么。大约几天后，在我去机场的路上，军人拦住了我们的车辆，我还以为……我当时携带着所拍的军官被杀的照片，尸体的照片、以及军官的衔章、一个催泪瓦斯罐以及天安门广场的纪念徽章。所以，除了纪念徽章以外，其他所有的我都扔在路边了）。

在屠杀的当天，走在大街上的时候，我还举行了约六、七个街头会议。每次我都说：“这一天，1989年6月4日，将永远载入史册。每个死去的人都是为世界革命而死的烈士，他们永远不会被忘记。世界上每个工人和学生都要吸取教训，而这教训极其简单。在这个地球上的任何地方，凡是任何有思想的工人和学生，都不会再对所谓的中国共产党政府抱有幻想。它再也无法宣称自己是一个革命政府。任何一个沾满中国工人和学生鲜血的政府就不再是一个共产主义政府。它再也称不上是一个革命政府。而从今天起，世界上的工人和学生都要与中国人民团结在一起。”

人们对这一讲话是反应非常强烈。有些人甚至企图把我架在他们的肩上。这真的让我真有些害怕！因为我们周围还是子弹横飞。但是那时我站在那里告诉大家中国需要的是一个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托洛茨基主义的工人党派，由此才能够把革命深入进行下去。至少曾经对中国共产党抱有的任何幻想都在这个夜晚永远地消失了。

被撕毁的党员证

当然，中国共产党有 4700 万党员，占总人口的 5%。在这场运动中的不少学生也是共产党员，大多是青年团成员。卷入运动的一些工人也是共产党员。镇压后的第二天，我亲眼看见两名工人当着我的面撕毁了党证。他们说：“由于政府昨晚所做的一切，我们再也不会相信它”。

中国共产党跟东欧或苏联的执政党是不一样的。至少在大屠杀之前，党内不少人士还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带领社会全面进步的革命组织。就中国经济而言，官僚主义只是相对地束缚了生产力，中国还没有像东欧那样对官僚主义形成全民痛恨。如果你是一名共产党员，你不一定是一个顽固的官僚或者工贼。但是如今这种情况已经改变。我看到，任何学生或工人，只要对最近几个星期发生的事件稍微有些常识，就不会再对加入共产党进行革命抱有任何幻想。

这场运动的爆发意味着中国共产党被架空了。在工厂和基层，共产党有自己的组织，随着运动的爆发，这些基层组织开始站在官方的立场上反对运动。但是，由于很多普通党员倾向于支持这场运动，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变得涣散。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就像 1980-81 年波兰团结工会事件发生时，共产党也随之崩溃一样。现在将很难在地方一级以相同方式重新建立党组织。新的共产党将是一个纯粹由恶棍和特务组成的“共产党”。

当然，我们不能说对共产党的所有幻想会就此一笔勾销。如果像赵紫阳这样的改革者能够接手政权；在未来时间他也许可以享受一段民众支持的“蜜月期”。但是，任何一个认识到这场镇压的人绝对不会再存在任何幻想。事情再也不会回到 6 月 4 日之前。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这就好比中国的 1905 年（译注：1905 年俄国革命，沙皇对工人运动进行了大规模血腥镇压）。

此后一段时间巷战仍在继续，城市成了战场。烧毁的卡车、烧毁的坦克、尸体鲜血遍地都是。周一总罢工的口号用血写在墙上。

人们的勇气是难以置信的。当他们站在街头面对催泪瓦斯时，他们希望知道我的想法。当那些说“知识分子才需要理论”的人看到发生的一切，就明白这绝对是一句废话，尤其是正在革命的人们需要革命理论。

但是反革命的力量越来越占据上风。整个形势对工人和学生而言，越来越冒险，甚至对我自己来说也是这样。这是一个颇令人沮丧的故事，我不想过多的谈论杀戮和越来越一边倒的战斗。

由此得出的一个普遍教训是，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爆发之前，需要一场建立在马克思主义观点之上的劳工运动。对革命而言，理论是最大的武器，它要优先于行动。武器、战术、战略、组织，相对于理论来说都是第二位的。当然，在工人阶级军械库里，枪械是致命的武器。但是，如果没有正确的观点，没有政治指导，枪械如同任何别的东西一样是不会被有效利用的。

一些资本主义新闻记者暗示：在不同派别的军队，38 军（北京军区）和 27 军之间，会有一场对峙。我认为这太夸张了。诚然，38 军曾经被认为是与“赵紫阳派”保持一致，与官僚中的改革派是一致的。当运动遭到镇压时，部分群众也开始期盼“解放者”：他们希望 38 军会进来“解放”这座城市。

“6·4” 1989 ——震惊世界的七周

38军被部署在这座城市的南部和东部的机场附近。但我认为，除非27军不得不面对一场来自工人成功的反抗，除非工人斗争在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爆发，那么斗争才可能继续深化。只有在这种情况下38军才会开进北京，他们会被视为“解放者”；为了恢复秩序和维持官僚统治会解散第27军。在那种情况下，李鹏、邓小平可能不得被替换，成为整个官僚体制的替罪羔羊。

但是，假如第27军已成功地粉碎了运动，38军还有什么理由开进来？他们的指挥官跟大部分的官僚一样，跟大部分认同在西藏和其他地区的镇压的人一样。他们只会对第27军说，“好，这个工作你们已经完成了，但可不要认为你们现在官僚阶层中具有决定性力量。如果我们出来对付你，我们将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你可能会得到应有的惩罚”。

现在邓小平已成功地稳定了局势。他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设法根除这一运动，维护官僚的统治秩序。会有很多很多的逮捕和杀害。对学生们来说，维持地下状态的活动是相当困难的，因为他们很容易被识别出来。官僚机构会把学生的照片发到电视上，几天之内就可以将他们逮捕。一部分阶层甚至部分无产阶级，在运动的初期会想，如果它赢了，我会支持它；或者至少保持中立，现在这些人会转而支持当权者，并会向当局通风报信他们身边的那些人。如果在运动的全盛时期社会上有99%的支持者，现在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局面。政府并非完全孤立。

如果有必要，“竹幕”将重新升起来。据报道，邓小平说：“如果我们大家都被吊挂在街灯上，那么外商投资怎么办？”除非是万不得已，他们不会主动脱离外资。他们可能会走一段中央经济集权的回头路。但镇压之后，他们可能会设法给工人和农民一些经济实惠。

同时，也许最终还会有替罪羊。李鹏是不得人心的，即使在官僚体制内部也是如此。据传，星期日的大屠杀发生后，他被自己的卫兵两次击中腿部。即便是一个成功的反革命政权也无法通过一个最讨厌的人物统治10亿人民。短期内除掉他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但在某个阶段，我想他会靠边站。

我相信全世界每一名工人和学生的心与已经飞向了中国的，飞向那些过去几周里在中国做出最大牺牲的人们。而对那些世界革命中死去的勇士们最大不敬就是让他们的牺牲白白浪费，没有在下一次的战斗中从他们的死亡中汲取任何教训。

如果邓小平认为在27军的帮助下——这个地球上此时最让人憎恨的一群士兵的帮助下，他就可以统治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的10亿中国人，那么他就犯下了天大的错误。没有任何办法可以阻止这样的运动不会再次爆发。它可能需要一些时间，但它一定会再次爆发。

一个国际马克思主义者的工作就是要确保教训被汲取，确保在下次斗争爆发的时候，马克思主义观点可以用来武装发生在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的运动。这样我们就可以说，这些同志没有白白地死去。未来几年后，中国成功的政治革命会是什么样子？1989年其实是真正的第一步。就想俄国1905年革命之后一样，中国在未来几年势必会有是一场成功的政治革命。

斯蒂芬·乔利 (Stephen Jolly)

1989年6月13日

中国群众运动大事件年表

1919年5月4日：在天安门广场上，北京有3,000名学生进行示威，反对凡尔赛条约的规定和而要在“民主和科学”。

1921年：由“54运动”所培养的青年人组建中国共产党，他们为俄国十月革命所激励而开始在中国建立以民族解放为基础的工人运动。

1925-27年：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中国共产党在斯大林主义控制之下的共产国际影响下，放弃了对由蒋介石所领导的“民族民主”斗争的领导权，这导致民族主义者杀害了他们共产主义的“盟军”并粉碎了工人的运动。此后工人运动失败的中国国民党将力量转移至农村地区进行游击斗争。

1944-49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指挥的游击军队控制了政权。虽然声称要执行“100年资本主义制度”，但他们被迫采取国有化生产资料手段以确保民族国家独立。但由于没有工人阶级的有意识的积极参与，导致一开始权力就掌握在官僚的斯大林主义的独裁者手中。

1958-60年：“大跃进”。试图由极端的集权化政策在中国大力发展工业。大跃进的失败和由此导致改革派官僚邓小平和刘少奇降低了毛泽东的声誉。

1966-76年：“文化大革命”。由毛泽东所引导的大规模青年运动将他们控制在“红卫兵”的体系内以消除官僚体系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而促使进一步强硬的中央集权化，封闭的自给自足。而最终红卫兵运动也被军队镇压下去。

1976年：毛泽东的逝世巩固了由周恩来、华国锋和邓小平领导的改革派。由毛泽东妻子江青领导的“四人帮”因为“文化大革命”而被审判。

1978年：“民主墙运动”。最初由邓小平所鼓励的以学生为主的大规模青年运动以反对所谓“左派”官僚和支持民主政治。然而，运动超出了“改革派”官僚的控制并且威胁到了整个官僚主义体系。因此邓小平镇压了运动并监禁200名参与者。

1986年12月——1987年1月：学生的新运动。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被邓小平逼迫辞职而且随着经济发展减缓，反对中央集权的改革派开始失去优势。

1987年11月：中共13大上，邓处于“半退休”状态并指定改革派赵紫阳作为总书记，大会决定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政策，但也带来了由李鹏领导的中央官僚“保守派”的重组。

1988年6月：北京大学发生的谋杀学生案激发了学生抗议，反映日渐增加的不满，尤其是在城市中经济改革政策导致通货膨胀率到达官方宣布的21%（非官方通货膨胀率达到31%）。

1989年1月：学生发生暴动反对非洲留学生。

4月15日：胡耀邦逝世，据说他的死亡发生在政治局进行激烈的争论期间。而这加强了官僚体系内“保守派”的力量以反对赵紫阳。

4月17日：10万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示威以纪念胡耀邦和支持民主。

“6·4” 1989 ——震惊世界的七周

4月21日：学生继续进行示威并且在当夜控制天安门广场。

4月22日：随着胡耀邦的葬礼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天安门广场上的示威仍然在继续。

4月24日：在北京学生开始罢课。

4月27日：不顾当局的禁令，5万名学生前往天安门广场游行，获得了一百万群众的支持。

5月2日：学生领袖们骑着自行车前往北京各地的政府部门和党的办公室以要求当局和他们进行对话。

5月4日：学生游行至天安门广场，广场上的群众人数达到10万。学生在其他10个城市中举行了游行。

5月13：1,000名学生开始绝食抗议以支持在电视转播中的学生和政府辩论中提出的要求和其他民主改革。稍后另外2,000名学生加入绝食抗议。

5月15日：戈尔巴乔夫抵达北京，学生对广场的占领变的永久化。

5月16日：示威仍然在继续，戈尔巴乔夫和赵紫阳在人民大会堂进行会面，当时有25万人聚集在外面的广场上。在上海和其他五个省会城市发生抗议事件。

5月17日：一百万人在北京示威。在其他七个城市发生抗议。

5月19日：军队开进北京。上海电视台播放了学生和当局之间的长达三个半小时的辩论。

5月20日：政府宣布戒严法实施。只有赵紫阳反对政治局的决定。学生和工人们大规模动员起来建立路障以阻止军队向广场开进。绝食抗议停止了，但是人们继续占据广场。在20个城市中的发生示威。

5月21日：示威仍然在继续。北京的军事指挥官公布戒严法。一百万人在香港进行示威。广泛传播的李鹏辞职的传闻稍后被证明是错误的。

5月24日：“改革派”的人大委员长万里结束了对美国的短暂访问而且试图集结温和主义的力量。但是，李鹏赢得军队领导的支持。

5月25日：示威的规模开始变小。

5月28日：中国大陆的运动有所衰退，而且官僚中的保守派继续巩固他们的权力。但是在葡萄牙的殖民地澳门和香港发生了最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6月4日：军队重新占领天安门广场，屠杀了数以千计的平民。此后发生了遍布全国持续一周的群众抗议、示威和罢工。



莫要哭泣，组织起来！
Don't Mourn, Organise!

中国劳工论坛
chinaworker.info
大陆售价：RMB15.00
香港售价：HK\$35.00